

研究論文

1895年乙未之役中的臺灣客家

林正慧*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摘要

臺灣於乙未之際的武裝抗日，一直是熱門且經典的研究課題，但多以彰顯民族主義為論述重點，因此客家在乙未之役中的角色常被忽略。是以，本文試圖以客家為主角，一窺南北客家在乙未之際肆應的全般面貌。

綜觀北部客家的抗日，有幾個面向值得注意：其一，存在游擊抵禦與隨官抗日兩股不同的抗日行動。其二，從官抗日的客家愈往南愈失卻主導力量。其三，北部客家的抗日，讓日本殖民政府不得不改變原本南北兩路並進的攻臺策略，以及必須增兵才得再向南推進，甚至深信必須採取無差別的鎮壓方式才得以威嚇。另一角度來看，北路客家的抗日，讓中南部較遲受戰火波及，也讓在臺南的劉永福，得有更多喘息布防的時間。至於南部六堆客家的抗日，亦存在兩種不同的抗日模式，一是隨官抗日，二是在地抗日。日軍於1895年10月下旬宣告全臺大致底定之時，南部

* 林正慧，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電子信箱：pipil119@gate.sinica.edu.tw

的六堆客庄卻仍是臺灣總督府的心頭大患，當地客庄的抗日直至12月中方以六堆總理向日軍乞降告終。

本文認為南北客家人抗日的可能因素有：保衛鄉土、從官殺賊與助官平亂的義民傳統、對新統治者的疑懼，以及維護舊制思想的可能。至於南北客家抗日的特色則有：善用防禦性民居、游擊戰與反覆欺敵之術、慄悍與頑抗的抗日形象，以及包括婦孺在內的全民參戰等。綜而觀之，自臺灣民主國成立之時，客家即參與其中，再經北客之抗日，由新竹甚至到臺南，乃至六堆客家之抗日，呈現的是一種樣貌多端，而又環環相扣的關係。客家的抗日，不僅牽制日軍南下的速度，迫使日本必須以增兵，改行軍政，厲行掃攘戰略以求占領臺灣，甚至在宣布平定臺灣後，六堆仍對殖民政府造成一定的壓力。

關鍵字：客家、乙未之役、邱逢甲、吳湯興、徐驤、六堆

Research Article

The Hakka Group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in 1895

Cheng-hui Li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aiwan People's armed resistance of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in 1895 is always a classic study of Taiwan's History. However, most of those studies emphasis on the nationalism, so the role of Hakka in 1895's battle is often ignor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ake the Hakka as the main character and give a glimpse of the general appearance of the North and South Hakka during the 1895's battle.

There are serval aspects worth noting when we take a look of the Hakka's armed resistance in North Taiwan: First, there hav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armed resistance to Japanese, one kind is under the government's command, and the other is guerrilla. Second, with the battle extending southward, the Hakka's resistance under the government command gradually lost their power. Third, the resistance of Hakka in North Taiwan has forced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change their strategy of attacking Taiwan by both side of north and south, even forced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send more

* Cheng-hui Lin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mail: pipi1119@gate.sinica.edu.tw

troops to push the battle line southward. Furthermore,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believe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an indiscriminate suppression method to force the Taiwan People surrender.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e armed resistance of Hakka in the north Taiwan delayed the battle in south Taiwan, made General Liu Yongfu and his armies have more time to prepare the battle. The armed resistance of Japanese of Hakka in the south Taiwan also has two different models, one is under the officer's command, another is resistance in their Hakka village, especially in Liudui area. Even when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y have controlled most of Taiwan at late October, 1895, the Hakka's resistance in Liudui area is still continuing. They did not surrender until mid-December of 1895.

Why the Hakka groups in north and south Taiwan decided to resist Japanese? In this article we conclude following possibilities: defend their homeland, follow the Yimin tradition of Hakka to help the government calm rebellion, doubt about the new government, or only try to protect their old traditions. A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akka armed-resistance Japanese in the north and south Taiwan, there are: the use of defensive dwellings, guerrilla and the repeated deception tactics, Swift and fierce and recalcitrant imag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whole people, including women and children, etc. From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since the establish of the Republic of Formosa, the Hakka has participated in it, and through the armed-resistance Japanese of Hakka in north Taiwan, from Hsinchu even to Tainan, and the armed-resistance Japanese of Hakka in Liudui of south Taiwan, we can find it is a kind of diversified appearance, and

the ring Interlocking relationship.

Because of the armed-resistance of north and south Hakka, the speed of Japanese armies southward have been delayed, and forced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send more troops, changed their strategy to occupied Taiwan. Even aft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y have controlled Taiwan, the Hakka resistance in Liudui area still exert certain pressure o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Keywords: Hakka,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in 1895, Chiu Feng-chia, Wu Tong-hin, Xu Xiang, Liudui

一、前言

中日甲午戰後，原本不在戰爭範圍內的臺澎卻成為戰爭的犧牲品，清國考量「臺灣雖重，比之京師則臺灣為輕；倘敵人乘勝直攻大沽，則京師危在旦夕。又臺灣孤懸海外，終久不能據守」（俞明震，1959：20），乃同意將臺澎割與日本。來臺接收的日軍自 1895 年 5 月 29 日下午登陸澳底開始，至同年 10 月 21 日占領臺南城，宣稱平定全島為止，期間面臨島內各地的反抗行動，前後費時 5 個月有餘。改朝換代的乙未年，全島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戰爭。

乙未之際的武裝抗日，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一直是熱門且經典的臺灣史研究課題，但多以彰顯民族主義為重點，這樣的論述方式，讓地域或個人的一切經驗、記憶被收納、整理於「國家」的框架中，忽略其中多樣而生動豐富的歷史像貌。（吳密察，1995B：51）晚近研究趨勢則將事件與人物重新回歸其所存在的時空環境，從地方社會的立場解說行動者選擇抵抗與否的動機。（李文良，2015：6）1980、1990 年代以後對乙未之役的相關研究，開始留意參與的成員，如翁佳音將臺灣土著抗日領導者分成士紳、富有資產者、總理頭人、民團首以及「匪」首等，（翁佳音，1986：89）黃秀政則認為，抗日義軍領導者的出身約略可分為文武生員、擔任鄉職者、富有資產者與綠林豪四類。（黃秀政，1992：333）此外，這些研究也開始注意到客家在乙未的顯著行動，如黃秀政言，中南部抗戰的義軍，其組成分子似以客家移民和漳州籍移民為主，（黃秀政，1992：268）吳密察更清楚地指出，在乙未之役中，發生頻繁遭遇戰的地域，即為客家占優勢的桃竹苗台地、丘陵地帶。也留意到當地抗日組織係由既有之組織性和戰鬥力集團轉換而來，以及邱逢甲召募義勇與日後抗日領導者間的關係。（吳密察，1995A）薛雲峰〈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 乙未抗日

戰爭為例〉一文，認為學者們過去多以各種「民族主義」情緒解讀乙未戰爭，因此無法合理解釋為何戰場上爭相出現義民軍以及仕紳們冒死抗日的現象，故提出以「臺灣客家史觀」檢視 1895 年發生在臺灣的乙未抗日戰爭。其所稱「臺灣客家史觀」，意指從長時段的臺灣社會背景中，觀察出臺灣客家人向有為了「保鄉衛梓」而組織義民武力的慣性，認為這個慣性也逐漸發展成前清時期全臺主要的社會特徵之一。（薛雲峰，2009：摘要、209）以該論文第五章改寫之〈「義民史觀」之建構：析論臺灣一八九五年（乙未）抗日戰爭中之義民軍統領邱逢甲與吳湯興〉一文，薛氏舉吳湯興與邱逢甲事蹟為例，認為他們的抗日實基於鄉梓鄉情的義民慣性，以「義民史觀」的角度，應更能正確理解乙未年及其之後發生在臺灣各地的抗日運動風潮。（薛雲峰，2008）但所論客家限於北部，且僅及邱逢甲、吳湯興二人，難窺客家在乙未之際肆應的全般面貌，且將乙未抗日視為義民史觀是否合宜，也待斟酌。

近幾年由於客家鄉鎮對乙未之役的重視，曾舉辦不少相關會議，如苗栗縣政府於 2015 年主辦之「一八九五乙未戰爭與苗栗客家研討」論壇，或桃園縣政府於同年舉辦之「乙未·客家紀念活動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皆有不少相關論文¹，但所論所述多偏重北部客家，或乙未戰後的影響效應，對於 1895 年在臺抗日的客家身影缺乏完整的勾勒與描述，亦為本文立意補強之所在。

若初步掌握乙未之役的相關資料，可以發現臺灣客家在乙未

¹ 如黃鼎松〈營頭嶼與貓裡山在乙未抗日及之後的角色演變〉、古雪雲〈尖筆山之役與苗栗保衛戰〉、鄭錦宏〈乙未抗日統領吳湯興事蹟考〉、黃子堯〈徐驥與乙未戰爭〉、劉煥雲〈丘逢甲的歷史評價〉、陳銀崑〈隘丁、腦丁與乙未戰役——以苗栗縣為例〉，收入邱蓬新總編輯，《「一八九五乙未戰爭與苗栗客家研討」論壇專輯》（苗栗市：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2016 年）；張海英、邱榮裕，〈從日人征臺資料論臺灣北部客家乙未抗日事蹟〉、邱榮舉、黃玫瑄、沈玉燕，〈乙未戰爭、客家與臺灣政治史〉、王保鍵〈乙未戰爭與桃園客家〉等，收入邱榮舉總編輯，《2015 桃園市乙未·客家紀念活動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2016 年）。

戰爭中的角色是一個值得深究的課題，尤其是日方與西方文獻，強調客家之抗日事蹟者歷歷可數，如言「意欲抵抗我軍者，是乃廣東移住民中的粵族，彼等在歷史上不辭為清帝效忠而破產喪命」。(蕭英伸譯，2004：115) 或言以客家為主的新竹支廳「較諸臺北，為先開發之地，從而人心之結合強固，此次加盟臺灣獨立團體者，似乎亦以本地紳士、紳商之輩居多」。(徐國章譯註，2005：33) 然而，在乙未之役中表現頗受注目的客方言人群，在以往強調抗日為發揚民族精神的歷史階段，僅被視為眾多抗日分子之一，其客家身分，及其本身在乙未之役的特別表現少被注意。是以，本文試圖以客家為主角，了解其在乙未之役的作為與角色。參考資料以中、日、西方與乙未之役相關的文獻或記述為主，中文方面如《邱逢甲信稿》、俞明震《臺灣八日記》、思痛子《臺海思慟錄》、吳德功《讓臺記》、洪棄生《瀛海偕亡記》、《劉永福歷史草》、易順鼎《魂南記》、《盾墨拾遺》、吳桐林《今生自述》、吳質卿《臺灣戰爭記》、連雅堂《臺灣通史》、蔡青筠《朝瑛漫錄》，日方如《風俗畫報》、《日清戰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等，西方則以 J. W. Davidson 等外國人士的記述為主。此外，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自 2016 年出版《乙未之役中文史料》後，陸續於 2018-2019 年翻譯出版《乙未之役外文史料編譯》(一)、(二)，其中不乏以往研究者較少利用之清代臺灣海關歷年資料、臺灣領事政經報告、《奧羽日日新聞》、《東北新聞》等，也是本文重要參考資料。

若從日本或西方的文獻資料來看，可以發現，客家是乙未之役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當時西人稱參與乙未之役的客方言人群為 **Hakka**，或日方稱為「客家」，這些稱述有其時代背景，但均係外來者的表述詞。當時在臺灣的客方言人群，在官方文獻中多被以「粵人」稱之，但民間已慣用以「客人」與「福佬」互稱，

即「客人」、「粵人」方為乙未之際客方言人群在臺灣的自稱，（林正慧，2015：198）然本文囿主要參考乙未之役時的西文或日文文獻，故多以「客家」稱之，特此說明。

二、邱逢甲的抗日與內渡

清末臺灣之防衛大體與臺北府、臺灣府、臺南府三府的區分一致。乙未之役時的抗日行動，也大致與這三區防衛相對應，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係自日軍於 1895 年 5 月 29 日在澳底登陸，至 6 月 7 日進占臺北府為止；第二個階段自 6 月中旬日軍越過淡水河南下，至 8 月底彰化八卦山之役為止；第三階段自日軍於彰化八卦山之役後休養，於 9 月初編組南進軍，分三路夾攻臺南開始，至 10 月 21 日在未遇抵抗的情形下進駐臺南城為止。（吳密察，1995A：545）

第一階段的抗日，約與臺灣民主國的成立與結束相始終，此間參與其中的客人，以邱逢甲為主。邱逢甲，字仙根，號闕仙，以逢甲子年生，故名逢甲，苗栗縣銅鑼灣人，後移居彰化縣。（丘瑞甲，1960：368）甲午中日事起，邱逢甲即積極參與防務事務，光緒 20 年 8 月奉命督辦團練，「於是奔走呼號，以守土拒倭號召鄉里，捐貲招募兄弟子侄成年者均命入營」，全臺編冊有一百六十餘營，特別編練者三十二營，以誠、信、壯、靖等十六字名營；每字五營。初稱團練，是年 10 月改稱義軍。（嶺雲海日樓詩鈔，1959：46）思痛子《臺海思慟錄》稱，時為「在籍兵部主事」的邱逢甲廣募民兵，以輔官兵不逮，稱為義勇統領，體制在諸將之上，與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往來文牘「悉用照會」。但其營制「與淮、湘諸軍異，與土勇亦相逕庭，營官不領薪水，逢甲月支公費數百金，兵則食數軍之半餉，器皆取給於官，或聽民自捐，不立營壘，無事安居，有事候徵調」，「數月之間，逢甲領去官餉銀

十餘萬兩」。自 10 月初招募，迄歲晚，全臺報成軍者約五、六十營。次年春，編入伍者號百四十營之多。（思痛子，1959：3）邱逢甲之弟丘瑞甲則稱「計成募者三十五營」。（丘瑞甲，1960：367）洪棄生謂「奏章稱其領義勇百二十營，實不滿十營」。（洪棄生，1959：4）

對於邱逢甲所募義勇規模與駐地，既有文獻呈現紛歧的說法，連橫稱「景崧既駐臺北，以逢甲率所部戍附近，備策應。」「而逢甲任團練使，總其事，率所部駐臺北，號稱二萬，月給餉糈十萬兩」，明確指邱逢甲時駐臺北。（連橫，1962：95、1034）吳德功則言，「邱逢甲之勇前紮在南崁，亦奔回紮揀東」。（吳德功，1959：39）但當時人在臺北，親眼見證臺灣民主國成立的 Davidson 則表示，邱逢甲是臺灣民主國成立時的首要將官之一，時任中部之義勇統領。（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199）邱逢甲之子丘念台亦稱，臺灣民主國成立後，邱逢甲奉命駐防臺中，並將義軍司令部設於臺中潭子大埔厝的自宅——柏莊。（丘念台，1981：60）

若參酌更多資料來看，其中應有階段性的差別。乙未之際擔任軍械局委員陳昌基在所著《臺島劫灰》中表示，乙未年正月月上旬，派統領全臺義勇邱逢甲趕募仁禮智信四項義勇共 20 營，分紮南崁、後壠及大甲沿海。（陳怡宏編，2016：87-88）。此議一出，邱逢甲似即速將北路所練義勇帶往中路，如蔡青筠寫於當時的信稿內容可知：

蓋自割地之初，官紳咸戴撫憲及林、邱諸人，議欲捍禦，以基隆屬蔭堂，淡水撫憲全林幫辦自守，臺南屬劉義，中路屬仙根。然區劃以口，未下檄咨。不料邱性過急，連夜開差下塹，所轄八營全時撤帳，淡民未悉底裡，譁謂刈地是實，故

邱軍裁撤，一時蠢動駸駸，閩府慌亂。淡之紳耆連銜稟見，備道撤凡突大駭，見詞應請調留，以綏輯民望。唐憲（景崧）亦有所悟，立下令箭赴暫調回；詎邱逢甲謂受撫臺親囑，不得更變，且堵防劃定，各膺責成，倘中屬有失，咎將安歸？竟不遵令，統兵自下。至苗，怒苗縣不為辦差，升苗大堂，打苗門子，縱兵辱及內署，苗縣匿不敢見，苗民因之鼎沸。此謂衛民，適以擾民，總緣書生驟進，故爾威福妄施，而上游顧重，俾以總統，蓋亦未識募軍有弊也。（蔡青筠《朝瑛漫錄》）

由上可知，割臺議定之後，唐景崧將中部防務交給邱逢甲負責，但邱氏似尚未接到正式檄咨，即南下竹塹，一度造成北部居民的恐慌，雖經唐景崧下令調回，亦不遵令，再往苗栗而下。

針對蔡青筠如上所述，陳昌基在《臺島劫灰》中有進一步的說明，他表示，乙未年 3 月間，因駐紮省城的廣勇每多滋事，唐景崧原意調邱逢甲統義勇至省城與黃義德之廣勇更換，但邱「抗不遵令」，「旋發令箭數次往調，仍不遵調來北，並將各營抽回中路，大有自主之意」。（陳怡宏編，2016：90）

但從乙未年 3 月間邱逢甲寫給唐景崧、俞明震等人的書信來看，抽回中路的義勇已陸續回防南崁、後壠等地，且正式使用「統領各路義軍關防」之關防。如邱逢甲寫給嘉義縣知縣鄧嘉鎮的信中提及，「中丞初擬調翼軍往南，而以義軍專防中路，兼任籌餉。旋因省垣後路空虛，復調赴北。現中、北兩路義軍已調至十營，逢甲自帶五營，誠字三營、靖字一營、捷字一營；以良字兩營，由陳進士登元分節，分防南崁等處，兼顧省垣後路，以信字三營由家兄先甲分帶別防新、苗一帶。」（陳怡宏編，2016：233、246）然而，由這些書信內容來看，邱逢甲與唐景崧之間已存在一定程

度的嫌隙。如邱逢甲在乙未 3 月 11 日（1895 年 4 月 5 日）的信中提到，南崁與後壠「皆逢甲弟兄所分防地。如布置早定，自可無慮，惟倉卒受命，故小費躊躇」，但受命之後，不僅督帶及各管帶關防未領到，槍械亦遲遲未給，「家兄關防未到，猶可率軍而行，如槍械未來，勢難徒手而戰。何日槍械到，家兄即何日行，逢甲即何日往紮南崁之元帥廟」。（陳怡宏，2016：236），或於 3 月 20 日的信中表示，原欲以舉人余紹賡任軍務營幫辦，卻未奉批准，「奉駁之件，此尚初次」，表示「如使全軍贊助之人紛紛告退，則逢甲一人難獨自辦理」。（陳怡宏，2016：239）而史久龍在所著〈憶臺雜記〉中提及邱逢甲所練義勇，「建議募義軍四十營，自備軍械，官給口糧，歸其統領。乃募之數月，只成八營。迨事迫檄調，而倉促復就數營。」（陳怡宏，2016：215）言下之意，軍械方面本應由邱逢甲自籌，其實際情形究竟如何尚待釐清，但可以明白的是，當時在槍械的交付方面，邱逢甲是頗有微言的。

邱逢甲在南崁、後壠一帶的布防似於乙未年 3 月 14 日（1895 年 4 月 13 日）邱逢甲移紮南崁元帥廟後較為底定，3 月 23 日給唐景崧的信中已經明確指出將如何安排誠字、靖字、信字各營之駐地（陳怡宏，2016：204、246）。但由書信內容可以看出他對所率義勇其實無什把握，除表示自己是「書生初出治軍，止能辦到『臨事而懼』四字，一切規模均未能闊大」外，更表示「義軍之出，可惜太遲」，「將領多門下諸生，兵士皆鄉間子弟」，「其間不無人才，皆未練習。勇丁善槍者雖多，將來止能使之自為戰，未可云節制之師。此時惟有以寬御眾，結以恩義而已。」（陳怡宏，2016：233、246）

除積極招募義勇外，乙未春割臺事確定之後，邱逢甲曾「電爭，繼以電罵，卒不得挽。遂集臺人倡獨立為民主國」。（丘瑞甲，1960：367）邱氏當時的激越陳詞，如「桑梓之地，義與存亡」，

或「臺灣者吾臺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自授受。清廷雖棄我，我豈可復自棄耶？」等，（轉引自梁華璜，1974：35）對激勵臺島民心，應起相當作用。清曆5月初2日（1895年5月25日），邱逢甲與林朝棟、陳儒林等人共推臺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由邱逢甲代上進賀表，並「臺灣民主國總統」金印，「同送至署請視事」，唐景崧受之，建元永清，旗用藍地黃虎。臺灣民主國成立之後，邱逢甲仍任義勇統領。（連橫，1962：93；吳德功，1959：34）²

客家參與乙未抗日從邱逢甲談起，原因有二：其一邱逢甲曾積極參與的臺灣民主國，是乙未之役的一部分；其二邱逢甲在日軍抵臺前擔任全臺義軍統領之經歷，帶領出不少日後在北部積極抗日的領導者。而乙未年間的邱逢甲最引人爭議，且至今仍眾說紛紜的有幾個面向：其一唐景崧電召各軍赴援時，是否積極北援？其二為邱氏於何時內渡？是否挾餉而去？是否參與武裝抗日？

關於邱逢甲是否積極北援唐景崧一事。臺灣民主國成立後第4日（1895年5月29日）日軍即登陸三貂灣，並一路沿九份、瑞芳、頂雙溪、暖暖漸次攻下，至6月3日並得軍艦之協攻，占領基隆。（程大學編譯，1977：3）6月4日，臺北省城粵勇焚署內變，「時喊聲震地，人相踐踏，入庫劫掠財物」，「各街市衙門糜爛」，加上火藥庫忽然轟炸，「連各處銃斃者共數百人」。於是唐景崧率親丁數十名乘夜奔逃滬尾德商忌利士洋行，並電催林朝棟、邱逢甲、楊汝翼帶兵赴援。13日電報曰：「千急急赴援」。14日曰：「萬急急速赴援」，然終「無一至者」。（吳德功，1959：39-40）

² 關於邱逢甲在臺灣民主國中的職務，有說為「內務卿」者（吳德功《讓臺記》頁35），有稱「大將軍」者（丘瑞甲〈先兄倉海行狀〉頁367），「義勇大將軍」（〈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頁47），或言係是「副總統兼大將軍」者（江山淵〈邱逢甲傳〉頁400）、羅香林〈丘滄海先生傳〉頁66），不一而足。以既有文獻互相參看，義軍統領是可以確認的，但其他如內務卿、副總統、大將軍等，可能尚待更多文獻加以佐證方可為定論。

計臺灣民主國自唐景崧就任總統以迄逃脫，為時僅 12 日，即瓦解於戎馬倥傯、人心惶惶之中，成為曇花一現的短命政權。（程大學編譯，1977：3）

對此，羅香林表示，省署遇亂時，邱逢甲人就在臺北，後因「府庫軍械入亂軍手，義勇不支，旋大潰」，方隻身逃鄉間，並收拾散亡，復集義勇，欲半途截擊日軍，但因「初值殘亂，軍容不振，交鋒未幾，復大敗，臺北遂為日有」。（羅香林，1934：131）但這種說法，與既有文獻甚有出入。吳德功甚至表示，「林朝棟、楊汝翼猶可云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而紮南崁之兵近在桃園，臺北有淮楚軍、粵軍十餘營，外無一兵一卒可援，何以電文如此其急，諸軍視如弁髦，此豈人所能解耶」。（吳德功，1959：40）事起當時，邱逢甲獲電後究有無積極北援實值探討。當時人在中部的史久龍表示，「南中各路，均安謐如常」，「當時閩城文武紳董，皆依舊腳靴手版，冠冕趨蹌，真可謂好整以暇者也。」而林朝棟與楊汝翼確「均急調赴北應援，乃行至新竹、大甲，擁兵不前」，「以意度之，知臺北必不守矣」，後林朝棟退回彰化，中部地區始「知臺北失矣」。（史久龍，1976：22）他的觀察並未及於邱逢甲。

從情從理，邱逢甲都應該急援臺北，戚其章曾為邱氏辯解之「丘部防線太長、兵力又分散、集結需要時間」等說詞都不足以作為不急援臺北的理由。以往認為邱逢甲有率部北援，只是至中途臺北已破，故在新竹與日軍相遇而發生激戰，但新竹之戰應始於 6 月中旬，與邱逢甲北援時間有落差，種種跡象都顯示邱逢甲並未急應唐景崧求援之電。（張曉輝、付祥喜，2002：62-63）

其二為丘氏於何時內渡？是否挾餉而去？是否參與抗日？

洪棄生表示，「當聞警時，大總統電召鄉紳林朝棟、邱逢甲於臺中」，但邱逢甲「及是亦不應，赴梧棲港舟先遯潮州」。（洪

棄生，1959：4）史久龍嘗言，邱逢甲所練義勇乃「烏合之眾，本不可用，甚至藉有軍械而為盜者。吁！達人早知敵人不來則已，來則必不守也。」（陳怡宏，2016：215）連橫甚至稱「逢甲亦挾款以去，或言近十萬云」。（連橫，1962：1034）對此，邱逢甲之子丘念台曾於《怙懷錄》中表示，「竊意乙未事變後，譏先父者或稱其挾巨餉，或稱其不死臺事。挾餉之謠，實由叛將呂某為倭捏倡之，而懷族籍之偏見者和之。惟先父生平衣食簡樸，身後家世清貧，潮梅人士多知之，無待辭釋」。（沈雲龍，1977：79-80）張曉輝、付祥喜認為邱氏內渡應在夏曆 6 月初 5 日，即陽曆 7 月 26 日。至於挾款說，則認為邱逢甲一行四、五十人離臺時僅攜帶紋銀 4,000 餘兩。傳為邱氏所挾之款，應是臺灣民主國成立後，唐景崧分次匯走臺灣藩庫存銀。（張曉輝、付祥喜，2002：64）然易順鼎《魂南記》於乙未年閏 5 月初 2 日（1895 年 6 月 23 日）記曰，當「倭氛已逼臺中」時，「時守臺中之道員林朝棟、楊汝翼、主事邱逢甲皆擁巨資，棄師潛逃」。（易順鼎，1965：7）則邱逢甲離臺的時間可能早於 6 月 23 日。

本文比較好奇的是，邱逢甲若於 1895 年 6 或 7 月始離臺，那麼，當桃竹苗客家抗日行動方熾之時，邱逢甲究竟有無參與其中？乙未抗日期間，其實不少邱逢甲可能領導抗日的謠傳，如 Davidson 曾提及，有個本地的將軍率領一批客家人的兵，也很受重視，（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188）或許指的就是邱逢甲。另一則日人情報亦稱，「改革臺灣政府之首創者為舊江頭人，係一文學家，其人已逃亡南部，並正募兵圖與我抵抗」，（程大學編譯，1977：47）或稱「據桃仔園居民謂：邱鴻甲（誤係「逢」甲之誤）林金爺（維孫力）正勒兵守在新竹縣」。（程大學編譯，1977：49）

羅香林表示，臺北陷後，邱逢甲「聞臺南義聲，咸躍躍思奮」，故欲與之約期會師，但因被日兵偵知，「防範綦密，不得乘」，「日人復以臺灣自主，為逢甲所倡，欲得之甘心，逢甲乃潛身深菁窮谷，至臺南失守，始痛哭歸，時光緒 21 年 9 月也」。(羅香林，1934：131) 所言邱氏晚至乙未年 9 月始離臺，與上述邱氏應於乙未年 6 月初 5 日內渡甚有出入，所述欲與臺南劉永福會師之議即使曾有打算終未實現，且進一步凸顯邱逢甲在中北部抗日行動中無積極作為之情形。邱逢甲之弟邱瑞甲對於邱逢甲有無參與抗日的說法，其實很含糊，「臺北告急。先兄率所部往援。至中途，而臺北破，唐已先去。日兵乃由鐵道南下，直至新竹縣。義軍力禦，經二十餘晝夜。初，戰皆捷，因槍彈少，不支。先後殉難者丘國霖〔應為邱國霖〕、姜少祖〔應為姜紹祖〕、吳湯興、徐驥，皆先兄前營部將。只因地淪異族，其烈不彰，至今思之，猶令人悲傷不已也。先兄知事無可為，乃回臺中，與先考妣倉卒內渡。時已 6 月初旬矣」。(丘瑞甲，1960：367-368)

從唐景崧發電急催的 6 月 5-6 日，到日軍開至新竹縣的 6 月下旬，邱瑞甲未說明其間的空白，「義軍力禦，經二十餘晝夜」的說法，似乎有意暗指邱逢甲亦參與邱國霖、姜紹祖、吳湯興、徐驥等人的抗日行動。然而若果真參與其中，為何中方文獻未有及，而日方、西方文獻僅存一二則相關謠傳？鄭喜夫在撰寫邱逢甲年譜時，曾收入邱逢甲門生謝汝銓所著之詩：「飛電燕京誓枕戈，待臣死後始言和；家資席捲隨唐遁，伏處羊城愧恨多。」意指「丘師只收拾家財，別無所取」，「恨之不死國難、鼓舞民心，竟先逃遁也」。(鄭喜夫，1981：100) 未抵抗而內渡，似乎也成為邱逢甲後半生的遺憾與愧疚，丘念台曾表示，「先父自臺內渡，其一生之痛苦，蓋不亞於吳湯興、徐驥之殉臺，豈臨難苟免比呈」。(沈雲龍，1977：79-80) 之後不僅將其子命名為「念台」，1912 年病逝

當時，最後的兩句遺言仍是「死了必須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記臺灣啊」。(丘念台 1981：105)

三、北部客家的乙未抗日

唐景崧離臺後，臺灣民主國隨之瓦解，但是日軍並沒有這樣就使臺灣屈服，反而在 6 月中旬向淡水河以南前進之後，受到嚴重的打擊。原本預估 1 個師團即能應付的接收計劃，也難以實現。(吳密察，1995B：33；鄭天凱，1995：36) 即如洪棄生所言，「自和約換，敵軍來，臺灣沈沈無聲，天下皆以蕞爾一島，俯首帖耳，屈服外國淫威之下矣；而烏知民主唐景崧一去，散軍、民軍血戰者六閱月」。(洪棄生，1959：3) 日軍自臺北府南下，首波面臨的就是以客家為主的抗日行動。而此現象，在臺北的外國人很早就察覺。如馬士於〈光緒 21 年淡水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提到，「在臺北，紳民原無亂心，惟臺中百姓與各營兵勇，深欲出於一戰」，另如 1895 年淡水貿易報告中記載「北臺灣民眾反應極為冷淡，抗命核心以激動之士兵及中臺灣人民為主」。(陳怡宏，2018：46、33)。或早在 6 月 6 日日軍攻入臺北之時，時任臺北府電信局員的 Han Seu 就已預知，「在臺灣北部，已不復見任一指揮者。惟余相信，在臺灣南部貴臺必遭困難。因在該地有土民及廣東人之故」。(程大學編譯，1977：34)

這一股蔓延於大科崁到新竹間的反抗勢力，是日軍欲自臺北南下時首先面臨的挑戰。日軍相關報告中不乏對這群抗日勢力的描述，如「在臺北新竹間有所謂慄悍無比之客家義民集團」、「在那大姑陷、大甲溪地區抗我之敵即是此廣東兵與土民兵」。(2019：216、263) 依洪棄生《瀛海偕亡記》中所言，「是時日本自臺北分隊南進，一循山道大科崁，一循官道過桃仔園，至大湖口。道大科崁者，阻於山海鎮胡嘉猷；至大湖口者，阻於吳湯興一軍」。

（洪棄生，1959：6）胡嘉猷與吳湯興俱為客家，他們在桃竹一帶分進合擊，抗日的地域略有區分，雖合作但互不隸屬。北部客家兩股不同的抗日勢力，蔡青筠也清楚看出，且予以地理位置的分界，稱「粵人聚屯眾多，自龜崙嶺以南至鳳山崎，皆大柯崁〔大崙崁〕、三角湧、新埔、鹽菜甕等處之人屯紮；鳳山崎以下，姜紹祖率北埔之眾扼守，吊橋折毀……」（蔡青筠《朝瑛漫錄》）以下即分述此兩種不同的抗日模式。

（一）新苗軍的隨官抗日

據乙未之役期間苗栗知縣李烱寫給其長兄的家書可知，其於1895年5月25日（乙未年5月初2日）接苗栗知縣不到10日，「而臺北大局變亂，奸民游勇乘機劫殺，帑金槍械，搶掠一空，各局所衙門皆成灰燼」。面臨此種變局，新、苗一帶人民雖聞風驚懼，但亦群懷義憤，「咸欲抵死相拒」，「不數日間，已得義民乙萬有奇」。（陳怡宏，2016：182）6月9日，以吳湯興為首的竹苗一帶粵人及林朝棟軍舊部齊會於新竹，「會者萬人，遍山漫野」。（吳德功，1959：42）究其參與成員，除原屬棟軍的臺北防軍營長傅德生、棟字右營長謝天德等人係於6月8日為新竹知縣王國瑞所留者外，（洪棄生，1959：6；蔡伯壘譯，2008：151），另有邱逢甲舊部，如吳鎮洸原屬邱逢甲統下之靖字正中營，邱國霖則屬誠字正前營。（丘琳輯，1958：44）以及吳湯興、姜紹祖、胡嘉猷等人。

吳湯興，字紹文，原籍梅縣蕉嶺高思鄉，苗栗銅鑼灣人，（陳漢光，1959B：18）與邱逢甲頗有淵源，據洪棄生《瀛海偕亡記》載，「初，湯興負意氣，遇邱逢甲統義勇營，慷慨自請。聞李鴻章割棄臺灣，則憤激作大言。逢甲亦鼓舞之，意氣益勃勃。逢甲故粵籍，湯興亦粵籍，聲類相翕。逢甲遂引見唐總統。總統方急時

事，逢甲言無不應，即給與湯興統領關防。」（洪棄生，1959：5）可見吳、丘二人因同為粵籍而「聲類相翕」，吳亦透過邱逢甲之引薦，而獲唐景崧授予統領關防，另據日方資料指吳湯興原為邱逢甲之副將，（許佩賢譯，1995B：382）吳德功則稱其原「帶練勇一營」。（吳德功，1959：43）由日方的調查資料來看，6月9日當天，吳湯興率領在苗栗招聚的七百多人至新竹，並自稱繼邱逢甲任統領，招記名提督前臺灣總鎮吳光亮為幕賓，號召新竹、苗栗兩地奪回臺北，（蔡伯壘譯，2008：151）可能因此，吳湯興一開始就成為竹苗一帶民兵，以及邱逢甲舊部、棟軍殘部的領導人。

姜紹祖，字纘堂，原籍廣東陸豐縣，居北埔，為金廣福墾戶姜秀鑾之孫，財產數萬。（連橫，1960：260；植亭，1907）姜紹祖也曾在光緒20年唐景崧出示招募土勇協防時，挺身往謁，獲委派募兵一營（五百），稱做「敢字前營」。次年正月（清曆）募軍完成，即駐紮於南崁港口後壁屋地方。日軍攻臺後，則返回鄉里，復散家財，募軍數百名，號稱「纘軍」。（陳漢光，1952B：6）³若由客家歌謠中一句「聞人逢甲編民勇，紹祖募兵樂自捐」（邱文琳筆錄，1995：33）來看，則姜紹祖的募勇自效，可能亦與邱逢甲有關。

臺北遭日軍攻陷後，胡友勝、吳國華等所率廣勇千餘人逃向新竹，（蔡伯壘譯，2008：145）由於「廣東勇個個腰纏充實」，復被「指為通日本軍，故意敗走，無交一戰，且放火燒撫臺衙、劫庫廳，皆彼等為之」，於是在向新竹南行的路上，遭中壢、新埔、九芎林等地粵族庄民挾擊殲滅殆盡，「至粵人部落，一響百應，周

³ 洪棄生則認為，姜紹祖原係領義勇一營防滬尾，因唐景崧離臺，乃返回新竹。見洪棄生，《瀛海偕亡記》，頁6。另日方資料表示，當時姜紹祖係以「自募的敢字左右兩營來效」。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382。

圍齊起，團團困住，搶者搶，戳者戳，可憐數千精銳廣勇，殺得乾乾淨淨」。(植亭，1907；蔡伯壘譯，2008：145) 李生〈回想錄〉亦言，「故至粵籍所居之地，如中壠以下及大湖口等，該勇殆無噍類矣，雖欲與新竹軍聯合亦不可得」。(李生，1907) 6月9日當天，吳湯興亦與傅德星等人聯手，搜殺駐於觀音亭的廣勇，「喊殺連天，客民乘勢攻下，數百餘名潰卒多遭殺斃」。(吳德功，1959：42-43；洪棄生，1959：6)

6月11日，新竹、苗栗紳民推吳湯興為主將，祭旗誓師，冀復臺北。當日吳湯興「易儒服為武裝，有起起桓桓之象」，並集首提督茂林二營、棟軍謝天德等營，及邱國霖、徐驤、吳鎮觥、姜紹祖諸鄉勇，共同祭旗誓師，設大鼓一面，築三丈高架掛之，旗幟整齊，立約法數章，有事則擊鼓，各莊聞鼓音即齊集其所，並約眾接濟糧食費用。(吳德功，1959：43) 連橫表示，當時吳湯興禡旗糾旅，望北而誓曰：「是吾等效命之秋也！眾皆起」。(連橫，1962：1034) 新、苗一帶抗日勢力，除前述邱國霖、吳鎮觥、姜紹祖外，另有徐驤、鍾石妹、徐泰新、黃南球等人。其中黃南球為竹苗山區重要墾戶、腦戶，頗有貲財，日方情報指其曾任義勇營統領，後為吳湯興副將。(程大學編譯，1977：58-59) 徐驤，字雲賢，俗號徐昂，原籍廣東嘉應州，苗栗頭份人。洪棄生曾表示，徐驤與姜紹祖二人，「徐家頭份，姜家北埔」，「二人亦粵籍，亦苗栗縣庠生」，「徐、姜成隊即行，結髮束褲，肩長槍，腰短槍，佩百子彈丸袋，游奕往來，以殺敵致果為事，人不知其為書生也」，並指二人為吳湯興陣營中最勇於衝鋒陷陣者。(洪棄生，1959：5-6)

由洪棄生所言「湯興歸，則大會鄉人盟誓，益作大言勵鄉氓。鄉氓亦粵籍，咸不願屬倭，聽其言無不悅，則各搜器械，具饘糧備應用」，(洪棄生，1959：5) 或植亭所言，「粵人秀才吳通亭，

奉新竹義民爺為主，倡首謀抗日軍，在義民廟前築壇高二丈許，自其上以碗為筭，擲於地，碗不破，眾疑是天意，大事可成，同種族一類皆應之」，（植亭，1907）可知竹苗一帶響應抗日的民兵皆為客方言人群。

6月12日，吳湯興以「統領臺灣義民等營吳」之銜，在新竹城內外張貼曉諭，自陳「謬蒙前撫憲唐委統全臺義民，事繁責重，蚊負堪虞」：

……惟當此臺北已陷于倭夷，土地及人民皆遭其荼毒，聞倭奴佔據後，則田園要稅、房屋要稅、人身要稅，甚至雞犬牛豬無不要稅，且被髮左衽，鑿齒雕題，異服異言，何能甘居宇下？本統領側然不忍，志切救民，故不憚夙夜勤勞，倡率義民志士，以圖匡復，以濟時艱，爾等踐土食毛，盡數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尚祈各庄各戶，立牽精壯子弟，須修鎗砲戈矛，速來聽點，約期勦辦倭奴。本統領開誠布公，甘苦共與，斷不妄自尊大，但軍令宣嚴，方能殺敵致果，並望眾志戮力同心，一團和氣，不可互相戕殺，不可挾釁尋仇，並不可觀望不前，各安各業，如有倚強欺弱，妄殺無辜，或肆行擄掠，糾黨劫財，定按軍法嚴（辦），決不姑寬，合行曉諭。為此，示仰各庄義民一體遵照，毋違。特示。光緒21年5月20日。（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二）：174）

Davidson 表示，這張文告四方傳播，為民眾所相信，驅使民眾急速地起來反抗。（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225）日軍方面的資料則顯示，「此等兵招募壯丁，胸間附上記有義民兩字之徽章」。（陳怡宏，20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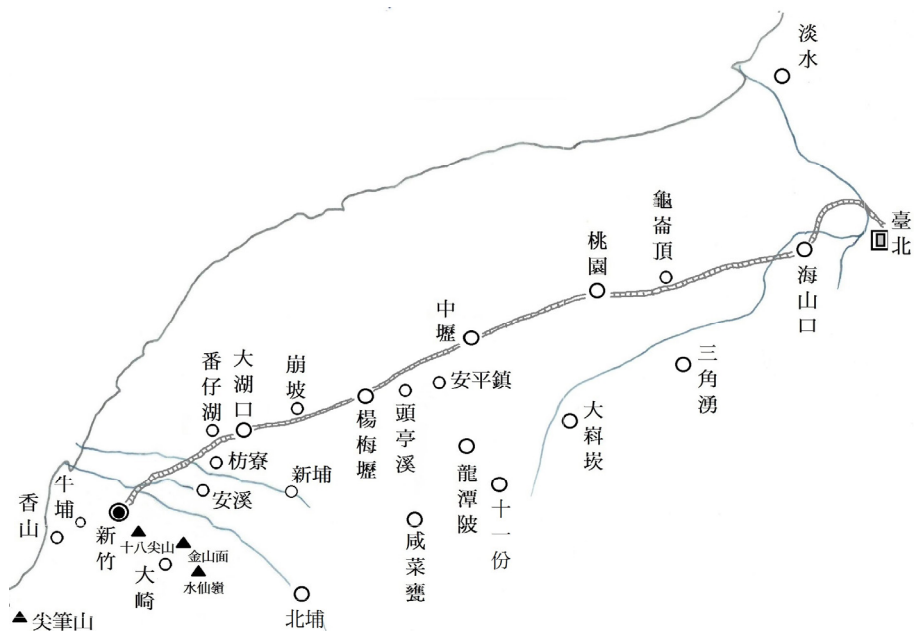


圖 1 乙未之役中臺北到新竹戰線

資料來源：「日軍攻台戰鬥地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2016/3/3 點閱)。

吳湯興等人原本打算收復臺北的計畫，在日軍已開始向新竹一帶推進的狀況下，守住新竹變成首要目標，於是除撥員至桃園、新竹間進擾日軍外，主力在據守新竹城前線的楊梅壢與大湖口。6月中旬，日軍近衛師團即將到達中壢時，吳湯興便開始部署出兵。此後，各路人馬便在平鎮、龍潭、大湖口等地與日軍纏鬥。(鄭天凱，1995：77) 6月14日，日軍欲往大湖口前進，途經頭亭溪〔即頭前溪〕時，發現當地民情突然一變，對日軍現出敵意，且未如沿途各村莊豎白旗向日軍降伏，反在街上路口張貼反日告示。前進至崩坡，該地民眾皆大門緊鎖，逃走一空。(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二)：33；許佩賢譯，1995A：103；陳怡宏，2019：74) 吳湯興已先令首提督茂林、傅宏禧二營，棟軍謝天德、

傅德陞二營，姜紹祖一營，吳鎮洸一營，各營均抽五成隊次楊梅壠一帶，故當日軍佐佐木元綱的偵察隊經中壠，即與民兵交戰，接戰一時之久，日軍退却，後有胡嘉猷自安平鎮率數百人助陣，圍攻日軍，但當日軍漸呈不支之際，日艦秋津州號剛好駛至鳳山崎，乃連續發砲數十響，義軍驚怖之餘，不免稍怠，於是日軍得以乘隙逃去。是役日軍死傷七十餘人，為攻臺以來的一大挫折。（吳德功，1959：45-46；黃秀政，1992：207）

同一天，吳湯興率領所部七百餘名自新竹出發，攻擊抵達大湖口之日軍，但很快便被擊退。15 日再度攻擊不克，雙方互相對峙，16 日，日軍因「敵人從四面八方射擊，無法前進」，且「吳軍多山民，善狙擊，彈無虛發，日軍仆者相續，遂大敗，退至中壠，或退至桃仔園」。（許佩賢譯，1995B：382；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二）：156-158；洪棄生，1959：7）此次衝突後，姜紹祖率領敢字營返回北埔，吳湯興則命其所部前進，分屯於大崩坡及大湖口間各處，並親自與若干親兵往來於苗栗、頭份街之間，利用大湖口的戰果，招募兵勇，並徵集糧餉、武器。黎景嵩亦予以聲援，答應補助軍費，其聲勢與日俱盛。（許佩賢譯，1995B：382）

之後，日軍為了占領新竹而特別編組一個千餘人的混成支隊，由步兵大佐阪井重季指揮攻擊任務，於 6 月 19 日受命從臺北出發，向南推進。21 日抵中壠，途中略受抵抗，及至安平鎮、楊梅壠、崩坡、大湖口，各處皆受猛烈阻擊，死傷甚眾。然日軍阪井支隊長仍衝過抗戰民軍陣線，完成由東北包圍新竹城陣勢，在大砲掩護下，於 22 日從東門入城，新竹城遂告失陷。（黃秀政，1992：208；鄭天凱，1995：72；程大學編譯，1977：5）日軍入新竹城後，吳湯興返回苗栗，一面等待黎景嵩於彰化編組中的「新楚軍」來援，圖謀再舉，一面著手整頓潰勇、編組新募營勇。姜

紹祖轉進北埔、樹杞林等地。徐驤則於 6 月 23 日率領二百餘名親兵前進，企圖阻斷日軍在臺北、新竹間的連絡線。（許佩賢譯，1995B：383）

6 月 23 日，苗栗知縣李焯集紳民議守苗栗，召吳湯興、徐驤、舉人謝維岳、富戶黃南球等人商議，並遣徐炳文至臺灣府請發軍裝、請領餉銀。臺灣知府黎景嵩因府庫已空，即准苗栗縣將該縣錢糧轉作勇餉，另檢軍裝給發。由於「苗栗一縣多廣人，李焯係廣東人，與紳民一氣」，官民一心，頗力振作。（吳德功，1959：46）⁴ 25 日，吳湯興、邱國霖率義民數百名自客雅山（又作客仔山），黃南球則率隊自苗栗方向襲擊新竹城，傅德生、姜紹祖等人則分由新竹西方及北方逼近，然在日軍機關砲、野砲的轟擊下，始終難以前進。（陳漢光，1959A：20；程大學編譯，1977：58-59；許佩賢譯，1995B：384）

6 月 26 日，臺灣府知府黎景嵩召集臺、彰、雲、苗四縣紳富會議，籌款守禦，開設籌防局，並圖恢復臺北。以花翎副將楊載雲為新楚軍統領。黎氏差人探知日軍止千餘人，又聞大崙崁及桃仔園、大湖口一帶臺民旋歸順旋即截殺，於是議籌餉械，欲圖恢復。除在臺灣府派富戶軍需及飭各保分局徵收錢糧外，並電請臺南派兵撥餉赴援。（吳德功，1959：47）黎景嵩所編組的新楚軍，是收編林朝棟渡清後留下的棟軍散勇，如令傅德生一營、鄭以金一營改隸新楚軍，再就地招募土勇組成，共 14 營，由楊載雲統領，多次被派往新竹地區與吳湯興所率的義民軍配合作戰。（連橫，

⁴ 乙未之役期間李焯寫給其長兄的家書中寫道：「五月杪，倭兵六隊忽來，因輪砲相攻，彈下如雨，我民不敵，遂紛紛潰散。倭夷進迫，遂占新竹。新竹已失，而苗栗甚危，欲堅守則無城池。紳民內攻外合，如事若有濟，必可□滅倭奴，以伸國憤耳。」所述內容應即是新竹已失守，號召議守苗栗之時的情形。陳怡宏編，《乙未之役中文史料》（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6），頁 182。

1962：1035-1036；吳德功，1959：49；吳密察，1995：42）6月底與7月初，義軍與新楚軍在新竹、後壠一帶與日軍的戰鬥，互有勝負，使黎景嵩的信心大增。（吳密察，1995：42）

7月10日，以民兵為主，官兵為輔的聯軍，多路進發，打算進攻新竹城的日軍，其中傅德生、徐驤等人率領七百餘人前進至十八尖山一帶高地，準備攻擊南門，姜紹祖則親自率領二百餘人，盤據火車站東方大厝，準備攻擊東門，新楚軍則沿海岸路前進，從牛埔山及牛埔庄方向前進，（許佩賢譯，1995B：384）此外另有彭錦松、林娘德、鍾石妹出埔頂，青草湖則有徐泰新等領導，列陣以為預備。（邱文琳筆錄，1995：34）但在日軍全力反攻下，進退失據，各自潰散。其中姜紹祖因所部遭日軍衝為兩段，一段奔潰，一部從姜紹祖受困於竹圍內黃屋，終遭日軍所俘。（邱文琳筆錄，1995：34；許佩賢譯，1995B：384-385）原為姜家長工，受姜紹祖母親之託，隨姜紹祖征戰以為照顧的湯錦輝與姜紹祖同時被俘，曾口述當時情景：

那時日本鬼排齊長蛇，銃尾鏢指著將我們兩個人毛辮子結做一磊，內有羅阿生略示反抗，當場就用銃尾鏢插入胸部，血流如注慘死了。大家看破，乖乖一連牽到武營頭去。路過東門河溝三板橋，日本鬼仔橋上過，我們就在橋底行，有時毛辮頭皮都被吊起來，滿肚怨恨心想只要有命，將來定報此仇。（邱文琳筆錄 1995：35）

湯錦輝並表示，7月11日，姜紹祖知事已不可為，託人交代家人死無怨言之後，即「取煙膏吞下，不久身亡」。（邱文琳筆錄，1995：35）

經此戰役之後，日軍在新竹的地位遂告穩定。其後，吳湯興等雖仍於7月23日前後對新竹城及其附近發動攻擊，但對日軍來

說僅構成零星的騷擾。歷經前此一戰，反抗軍幾乎可以確定，只能退守苗栗。(黃秀政，1992：211；鄭天凱，1995：77)

(二) 桃園至新竹間的游擊戰

日軍平定雞籠、臺北、淡水之後，由於新竹縣方向民情尚不穩定，故近衛師團乃命第二聯隊第二中隊往之偵察，該隊於6月12日黎明從臺北出發，沿著鐵路線過桃子園，於13日抵達中壢，並在桃子園、中壢之間設遞步哨。途經中壢時，發現以中壢為首，其附近十二、三個村落的居民都是廣東人。(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二)：33)從軍者的報告亦稱，「中壢附近之十三處村莊，有全無外人夾雜之廣東人村落，因與他處無來往，故與臺北、桃仔園之風貌大相逕庭」，「此地之語言與習慣，似皆為廣東風格，與他處毫無交流也」。(陳怡宏，2019：73)。與日軍同行的Davidson提及中壢郊外的村民時表示，「村民看起來非常和平友善，大部份是客家人，客家婦女髮型額似日本女子，而且不纏足。有位伺候我們的客家小女孩正在洗衣服，她有張非常可愛的臉蛋。」(呂理政、謝國興編，2015：238)或稱「客家是華人中頑健的種族，其風俗習俗與其他華人不同，其婦人不纏足，髮飾有些與日本婦人相似，新鮮而不難看」。(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220)曾投宿中壢民家的隨軍記者亦有類似的觀察，「此地有十三個村落居民，多數是廣東移民，感覺風俗習慣與其他地方不同，像女孩都是天足，頭髮亦像日本農家女孩留辮子，出門則以黑色棉布從頭遮住臉，像是日本所稱的頰冠，是為一奇」。(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二)：162)

但之後日兵多次在桃園至新竹一帶遇襲，並造成中壢、桃子園之間的連絡斷絕。如6月13日，日軍派至三角湧的斥候騎兵遭當地居民用計襲擊或殺戮。6月中，日軍在往大嵙崁推進的過程

中，曾遭龍潭陂庄民據壘射擊。（吳德功，1959：43-44）16日接獲情報得知，新竹縣約有三千「敵軍」，以一個中隊不足以應付前進，近團師團乃決定派遣一個大隊向新竹推進。（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一）：432）

新竹以北的客家抗日勢力，主要有安平鎮的胡嘉猷、龍潭坡的黃藐二、黃娘盛，十一份的李蓋發等都各自招聚三、四百名民兵，另咸菜棚街有夏阿賢、鍾統等人招聚五、六百名民兵。（許佩賢譯，1995B：383-384）胡嘉猷，或名胡阿錦、胡老錦，別號甫臣，原籍廣東梅縣，安平鎮（桃園平鎮）人。（陳漢光，1952A：23）洪棄生稱胡嘉猷「本淡水縣吏，時自臺北歸，聞日兵至，閉竹林登礮臺發槍」。（洪棄生，1959：6）日方的情報則顯示，胡嘉猷曾受唐景崧之命在該地招募兵勇，臺北陷落後暫時觀望形勢。直到眼見一隊日軍孤兵深入，乃嘯集黨羽進行抵抗行動。（許佩賢譯，1995B：383）以上各股在地招聚的客家抗日勢力，主要目標即在破壞日軍由桃仔園自新竹間的兵站線與連絡管道，如日軍前鋒於6月22日進占新竹，翌日，胡嘉猷、黃藐二、李蓋發等人與率二百餘人來會的徐驤，合力在桃園、中壢、楊梅一帶襲擊日軍，竟使攻城之消息無法通知臺北之近衛師團本部。（曹永和、吳密察編纂，1986：537；許佩賢譯，1995B：383-384）一名當時防守新竹城的日軍表示，「附近的敵人陸續出現，幾乎把我們跟臺北的連絡切斷，一不小心新竹城有被孤立的可能」。（石光真清著，梁華璜譯，1983：77）其後，由於日軍逐漸增援，24、25兩日的戰鬥客民小挫，徐驤、胡嘉猷乃暫退安平鎮庄，李蓋發、黃藐二等人則退往龍潭坡。（許佩賢譯，1995B：384）

北路客家的堅定抗日行動，也影響原本不抵抗的大嵙崁等地對新政府的態度。由一封駐大嵙崁總兵余清勝致日軍吉野之函中稱，「去月大科崁紳民誠意為撫，實亦出於至誠。迄今並無他意。」

新苗之士庶皆以主戰為是，不勸以順和」。(程大學編譯，1977：80)日軍資料中亦表示「吳湯興之謠言煽惑，而引發大姑陷客家蜂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4)或《東北新聞》對近衛軍的近況報導中亦稱，吳湯興「煽動大姑陷、三角湧附近草賊，收得到剛砍下之我軍首級，便給予銀錢」。(陳怡宏，2019：223)可見當時主戰的「新苗之士」對大崙崁地區的抗日態度應有所影響。李文良的研究也表示，自清軍撤離至6月中旬期間，大崙崁地方並不是一開始就對新政權抱持著堅決武裝抵抗的姿態，而是歷經一個整體的變化過程。由地方士紳和軍事領袖組成的安民局，曾經主動試圖和新政權建立穩定和平的關係，但這種態度大概在6月20日左右有了明顯的變化，由於南方的新竹、苗栗已明顯主張採取武裝抗日的立場，加上7月初傳來臺灣府知府黎景嵩籌防禦敵的檄文，使得大崙崁地區的士紳決定抵抗日軍。該文認為大崙崁地區轉行抗日，是6月下旬北臺灣社會氛圍轉變的結果。(李文良，2015：15-26)

於是新竹以北的抗日陣營逐漸擴大，如6月26日，日軍因「中壢平頂各路尚未疏通，沿山之民時常逼城」，故分三路攻勦：一由新竹大路，一往安平鎮，一往三角湧。結果，往安平鎮方向，即遭胡嘉猷「扼守竹圍，迴環重疊」，致日軍傷亡百餘人，力疲收隊而回。往三角湧方向者，亦遭遇三角湧義民黃曉潭、蘇力、蔡國樑、黃國添、張龍安等率眾力拒，「開地窟以陷馬足，沿山埋伏」，死傷亦百餘人。日方後經駐大崙崁的前清總兵余清勝引導，方攻下三角湧。「但平頂之民，恒聚眾劫糧，雜沓紛至」。(吳德功，1959：47-48)

6月下旬到7月初，臺北到新竹之間的鐵道、電線或兵站設施仍不斷傳出遭破壞的消息，零星部隊亦頻頻遇襲，臺北城內外更是謠言百出，人心動搖，如謠傳「現得警報，客眠〔民〕聚眾數

千，團積三角湧之崁仔腳，擬早晚乘虛襲臺北」。(轉引自梁華璜，1974：76)或有飛報曰：「黑旗兵及客家大軍已逐漸迫向首府推進，大稻埕不日將復蒙戰火」。這些謠傳，讓臺北一帶的居民極度恐慌，乃「競相逃之中國內地，勿論輪船小艇，夕載數百歸去，翌晨復候於海岸西望者數千，運輸之頻繁，可謂空前未有也」。(程大學編譯，1977：86)加上因為撥兵前進新竹等地，致臺北防務顯得空虛，總督樺山資紀遂於6月29日向大本營請求增援，經獲准後，決定由當時駐守於遼東的第二師團中抽編一個旅團編組為「混成第四旅團」調派來臺(鄭天凱，1995：86-87)。

據偵察結果，日軍判斷抗日主力據點為安平鎮的胡嘉猷，與龍潭陂的黃娘盛、黃藐似等人，「據了解此股賊徒於清國統治時期，已不接受其統治如自成一國。且其性驍悍，清兵不敢與之對敵」，「其住居又處於構築堅固防禦設施之森林中」，「附近之本地民大體上投靠於其勢力之下」。日軍遂於6月25日發布訓令，表示「敵方猛將黃娘盛、胡嘉猷」常於距中壢約一里半的安平鎮「侵襲我部隊之後方，妨礙我方交通動線」，為「擊倒此敵」令第一聯隊第一大隊於27日先集於中壢，28日晨展開攻擊。(蔡伯壘譯，2008：156；陳怡宏，2019：98-99)此次進攻礙於其牢固之防禦而未成，乃於7月1日再度進擊，經動用步兵二中隊、砲兵一小隊、工兵二小隊展開攻擊，原亦久攻不下，經投擲炸藥，屋牆應聲崩塌，「但敵方仍未見絲毫膽怯退縮之狀」，經日軍猛烈攻擊，民兵終於趁夜棄堡壘而退，「翌日偵察時已無隻影，僅見棄屍累累」。此役後日軍在中壢附近之兵站線鐵路，得以確保安全暢通無阻。胡嘉猷則撤往龍潭陂，徐驤退向北埔。(蔡伯壘譯，2008：157；許佩賢譯，1995B：384)

上述二次的安平鎮之役，讓近衛師團了解以目前的兵力不足以鎮壓臺民的抗日行動，除如前述向大本營申請增援混成一旅團

外，並斷然中止預定的南部作戰計畫，決定將原本預定在臺灣南部登陸的第二批運送部隊迅速調集臺北，先傾全師團之力循陸路由北向南推進。（許佩賢譯，1995B：163；曹永和、吳密察編纂，1986：537）於是，7月2日臺灣總督致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表示「佔領新竹之後，其附近土匪自稱義民，出沒於沿道山間，破壞鐵路電線，或據於村落，妨害我軍，害苦良民，我軍要加以掃蕩又有困難，致臺北人心亦發生疑懼。故不得不改變計畫，為先行鞏固北部之安全，應向南部推進之近衛兵，令其在山地登陸，一舉掃除賊巢，以除後患後，始向南推進」。（程大學編譯，1977：74）

7月13日，龍潭坡黃娘盛與胡阿錦，協同招募民兵約三千名截擊日軍，殲滅日軍櫻井特務曹長以下一隊兵員，14日，在龍潭坡的黃藐二偵知日軍從中壢方向前來，便傳警四方，嘯集附近庄民五百餘人，劫日軍運糧隊，殺護糧兵29名。山根支隊長急派精銳步兵進攻龍潭坡，由於龍潭坡市街外緣有叢生的竹林，從外面難以望見內部，頗難攻下，但終以優勢兵力勝之，黃藐二等人退往咸菜棚街方向。而先在銅羅圈庄招聚一百多人的胡嘉猷，此日亦與日軍交鋒，倉皇退往橫崗下西南高地，因咸菜棚街夏阿賢、鍾統等率五百餘人來援，並在該地構築防禦工事，拒阻日軍前進。16日，受到日軍攻擊後，亦退往咸菜棚街。（許佩賢譯，1995B：388；程大學編譯，1977：5）

除胡嘉猷等人在安平鎮的抵抗外，日軍在三角湧與大嵙崁亦面臨相當大的挑戰。7月12日日軍從大嵙崁溪兩岸及兵站線分三路前進，企圖掃蕩潛伏在新竹以東、大嵙崁、三角湧地帶的反抗勢力。（許佩賢譯，1995B：165）其中枋城支隊率所部894名（約一大隊）至三角湧街時，當地人民不動聲色，虛與委蛇，殷勤替日軍搬運物品；暗中則派人連絡大嵙崁義軍合擊日軍。13日日軍

自三角湧向大嵙崁前進時，復遇大嵙崁與三角湧義民合擊，日軍四竄無路，進退兩難；經數度猛攻，死傷極多。（黃秀政，1992：212）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大嵙崁、三角湧等地並非客方言人群優勢聚落，但當時日軍情報或西人印象，都認為該兩地抗拒日軍者多為「客家」，如言「推進臺灣府之日軍，頃在大姑陷附近之地，受客家大軍之要擊」，「先前中國將領撤退之際，將多數毛瑟鎗，Wmchester 連發鎗，及可觀彈藥遺交客家，如今彼輩均已熟練此等武器之使用，對日人而言係重大威脅。客家本諳通山地形狀，且自幼即生長於溪嶽之間，習於接戰，其戰鬥員人數亦不下一萬之譜」。（程大學編譯，1977：85）或言「大姑陷附近的民眾是本島中最为剛猛驍悍的客家人」，（許佩賢譯，1995A：165）或言「大姑陷河兩岸有無數之民兵，其為獐惡的客家人」，（呂理政、謝國興編，2015：122）以及提及三角湧「村民等仍如往常外表誠厚，翩翩白旗於屋前，殊無異狀，日兵自放心卸下兵器，詎料藏於家家隅隅之數千客家，竟齊然開始射擊」。（程大學編譯，1977：87）若是嘗試解釋這些說法，一是鄰近大嵙崁、三角湧的客家亦參與該地的抗日行動，這個部分由該地曾發現女性抵抗者的情形來看，應不無可能。二是受客家抗日立場鮮明的影響，而將該地抗日民兵亦視為客家。外國記者麥雅士氏在所撰乙未之役臺灣北部之報導中，十分強調黑旗軍之進攻北部，及客家義軍之奮勇抗日情形，王世慶認為就此來看，可見當時臺胞對客家與黑旗軍期待之情形。（王世慶，1989：91）

這些由土豪、鄉紳所率領的抗日勢力，經常在日軍大隊來時舉白旗表示歡迎，卻也利用地理條件，對零星的日軍進行游擊性的襲擊。這種游擊性的抵抗，使日軍無法確實分辨敵我，而且杯弓蛇影，疲於奔命，發揮了很大的作戰效果。（吳密察，1995A：

546；吳密察，1995B：37）於是，總督樺山認為，「由於本地民乖戾狡猾，極其執迷頑固」，「非予以痛懲，將來必無法加以懷柔綏撫」，（蔡伯壘譯，2008：175）7月17日即對近衛師團長發訓令表示：「賊兵是從附近諸村落招募的民兵，非固定隊伍，平素住居其家，武器彈藥亦藏於屋內。逢我優勢軍隊，則所謂箠食壺漿迎之，若巧逢我小部隊，則招誘而襲殺之。」因此要求近衛師團長今後對反抗者必須「嚴予臨機處置」。然而由於無從分辨真正的「良民」及所謂的「賊兵」，「嚴予臨機處置」的結果，往往就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7月18日，坊城大隊即在三峽一帶展開「無差別掃蕩」，20日，總督府更進一步下令，對臺北、中壢間鐵路線以南的大漢溪河谷一帶展開第一期掃蕩。（鄭天凱，1995：80-81）

第一期的「掃攘計劃」，自大嵙崁向三角湧前進。近衛師團長重新配置麾下之武力，編組三支隊計畫對臺北——中壢鐵路線以南至大嵙崁河谷一帶地方進行掃蕩。各支隊於21日在指定地點集合，三支隊分由大嵙崁、海山口（今新莊）、臺北三處向三角湧包抄。（轉引自梁華璜，1974：77）此次掃蕩歷時四日，日軍入三角湧街後，火燒民房，見人便殺，至二甲九、福德村、土城庄等地亦焚燒民房，任意殺害鄉民。（曹永和、吳密察編纂，1986：538-539；黃秀政，1992：215-216）一位在臺北的西人則表示，「臺北以南十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約有六萬人口無家可歸。7月24日，砲聲轟隆有如雷動，蓋係銳意逼近首府之客家及生蕃之先鋒，復與日兵交火之聲」。（程大學編譯，1977：88）據日軍之記載，在此役民軍戰死者五百餘名，民房被燒燬者一千餘戶，（程大學編譯，1977：6）而「民性極為瘴惡的客家族，遺棄屍體不下四百」。（轉引自梁華璜，1974：77）

7月28日日軍又下令展開第二期的「掃攘計劃」，仍由山根支隊和內藤支隊負責執行。其「掃攘」之地區，主要包括楊梅壠、

龍潭坡、銅鑼圈、牛欄河、新埔、大湖口等地，沿途曾遭遇義軍的堅強抵抗，但因日軍在裝備、訓練和組織上皆具有絕對的優勢，義軍終告不支，而紛紛潰散。日軍所至，仍然肆行屠殺鄉民，焚毀民房不少，所到之處，立成焦土。（曹永和、吳密察編纂，1986：539；黃秀政，1992：216；鄭天凱，1995：81）

（三）苗栗攻防戰

新竹城之役敗北未久，吳湯興對於新、苗一帶的抗日民兵重新加以整編，7月12日（閏5月20日）以「統領臺灣義民各軍五品銜生員」之名義向臺灣知府黎景嵩呈文，表示所招之義民先鋒辨勇共二千名，編為五營。除衛隊中營一營隨身差遣外，其五營為：徐驤一營，扼紮北埔，會同傅德生、姜紹祖防守枋寮沿山一帶；邱國霖一營，扼守尖筆山沿山一帶；張兆麟一營，分守三環、水流東；陳超亮一營，駐防深井；黃景嶽一營，仍守苗栗，俱係扼要隘口。



圖2 吳湯興統領臺灣義民五營

呈文中提到「雖義民尚有數萬，然草野農夫，散則為民，聚則為兵，只可應敵，未能調防」，其實意味著若官方不提供餉械，則各地庄民只會為鄉里而戰，而難為官所驅使。因此此呈文的主要目的，即在希望黎景嵩「再撥精勇二、三營，星夜拔隊前來，以資守禦」大湖口、關子河、後壠、通霄、香山各處，以及希望

陳澄波率一營守中港，「該營早既成軍，其按月應領之薪朴，係由臺灣縣分局答應籌撥，並請諭飭該局，速籌解用，源源接濟。仍飭多備一營餉糧，俾陳澄波添募數百名，厚其兵力，壯其聲威，禦侮折衝，斯無將寡兵微之虞。該處委係通衢要道，非仗雄兵鎮守，難期有備無虞」。(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四)：42-43) 值得一提的是，該陳澄波原為棟軍參贊，也是光緒十五年參與大湖一帶墾務廣泰成墾號的投資者之一，(黃富山等解讀，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編輯，2013：274) 應亦為客家。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有件藏品，係「管帶興字副中營」黃景嶽於光緒 21 年 6 月造報之「新募各哨官護勇什長正勇伙勇姓名清冊」，由該清冊中可知，新募兵勇係於 7 月 8 日(清曆閏 5 月 16 日) 點驗成軍。除黃景嶽為管帶官外，另謝桂芳任幫帶官，內含中哨、前哨、後哨、左哨、右哨，每哨 6 隊，每隊 11 人，可知每營除管帶官、幫帶官外，有勇 330 員。該清冊亦載明勇丁之年齡、居所，故可知該營勇募自苗邑大湖庄、濫坑庄、月形角庄、興隆庄、西山庄、雞隆庄、新雞隆庄、加盛庄、大田庄、崁頭屋庄、大坪庄、永盛庄、天花湖庄、吞霄庄、單蘭庄、新港庄、老田藜、田藜庄、枋藜庄、獅子頭、鹿廚坑、南勢坑、貓裡街、公館、北坑、二崗坪、中興庄、坵埤仔、中心埔、大埔園等地，是一個以客方言人群為主的勇營。(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正當重振旗鼓的同時，抗日陣營卻開始面臨因餉源或領導權而引起之內訌。7 月 16 日，苗栗知縣李焯與吳湯興二人因軍餉事互相攻訐。由於吳湯興所部之勇「每人月餉洋銀十二元，開銷頗巨，疊向縣中索取，不給其用，即將糧串自行徵收」。李焯因此不滿，行文黎景嵩，表示「吳湯興徒博虛名，全無實際，所收餉多為中飽，前各軍攻打勝仗，皆徐驤之力，而興冒為己功」，希望保舉「苗人富戶黃南球」為諸軍統領。吳湯興亦備文指責李焯

之不是，亦請黎派員代換。黎景嵩對此爭議無法解決，仍令苗紳為之和解，但情勢似乎未見好轉，於是李焜、吳湯興二人均「俱稟臺南幫辦劉」，劉永福則回電表示，將派吳彭年「到地查明情節核辦」。（吳德功，1959：51）由此也引致黑旗軍帶兵北援。

7月19日，劉永福派遣黑旗前敵正統領吳彭年、副統領李維義率領二營抵彰化。（吳德功，1959：52-53）7月20日，吳彭年致函劉永福，「重申新竹之吳湯興實得力」，（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四）：406）表示支持吳湯興之立場。但到彰化之後的吳彭年，卻面臨黎景嵩有意以副統領李維義以分其勢的牽制行為。25日，黎景嵩以李維義代楊載雲領新楚軍，抵中港，駐紮頭份街，隨帶黑旗兵三百餘名往攻新竹。（吳德功，1959：53）

日軍進駐新竹之後，官民兵逐漸退守到新竹城南邊枕頭山、雞卵面乃至尖筆山等地。這一帶綿延的山地，是阻止日軍南進的重要天險，抗日軍在8公里多的防禦陣地上築起百餘個堡壘。8月5日，黑旗統領吳彭年帶屯兵營管帶徐學仁、黑旗親兵管帶袁錫清、幫辦林鴻貴，總計三百餘兵，自彰化拔隊往北，6日駐紮苗栗，與義民各軍統領吳湯興部署防務，協同抗日。（吳德功，1959：54）

8月8日，近衛師團分數路向枕頭山、雞卵面推進，並部署野砲，且有兩艘軍艦巡弋新竹外海砲擊尖筆山，以為聲援，（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231）於是鎗砲聲震山谷，吳湯興等各路義軍皆不敵，紛向尖筆山撤退。（黃秀政，1992：218；吳德功，1959：54）9日清晨，日軍再由海、陸兩方向尖筆山進攻，巨砲齊鳴，轟隆之聲震動山岳。（鄭天凱，1995：91）尖筆山守將張兆麟、邱國霖各率所部義軍據壘抵抗。吳湯興、徐驥、陳超亮、陳澄波、林學院、黃景雲等則在尖筆山東西兩麓督軍策應。日軍

挾其優勢火力，轟毀尖筆山堡壘，吉野、浪速兩軍艦亦發砲助戰。張兆麟部先潰，邱國霖繼之，吳湯興等部亦難以支撐，紛紛敗退。日軍隨軍記者對此役的形容是，「到處燒毀民宅，烈焰冲天，各方面的戰線逐漸擴大，這簡直就是全面大戰，可稱豪壯」。(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三):356)當時美國隨軍記者 Davidson 表示，日軍預估據守該地的民軍兵力強大，預料必有猛烈攻防戰，但敵人只是「滿山遍野的狂逃，在逃時棄掉其豪華的軍裝」。(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231)同日，近衛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亦率所部之第三聯隊，攻入頭份街，楊載雲、李維義率軍出擊。楊載雲中彈身亡，所部潰散。尖筆山陷落，頭份街不守，義軍在淡水、新竹二縣境內已無立足之所，只能向苗栗撤退。(程大學編譯，1977:6;黃秀政，1992:218-219)

8月13日，能久親王親率兩個旅團兵力，分成三路攻進苗栗。是時，苗栗守軍，皆係自新竹、尖筆山、頭份等地轉戰後撤之義軍，多已精疲力竭，傅德生軍潰，吳湯興軍亦潰，陳澄波一營聞風先竄，徐驤退至義民亭，糾吳湯興潰兵憑山再戰，袁錫清、林鴻貴戰死。日兵遂入苗栗。苗栗知縣李焜潛行大安港西渡。(洪棄生，1959:12-13)日人進入苗栗之後，發現這個以客方言人群為主的聚落顯得特別不一樣，如認為「苗栗附近的人士對我有敵意，有組織義民兵之徵兆，其大部分逃到附近的山中」。(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三):253)或言「該處市街戶數不足千戶，人民奔走它方，幾近荒蕪」，「當地市民，深懷疑懼」，「留於市內者僅數十戶，貴重物品悉皆運離，市街多數為空屋。」(徐國章譯註，2005:49;陳怡宏，2019:190)

尖筆山與苗栗之役，是北客抗日的一次空前大結合，也是以義軍為主體戰力，黎景嵩的新楚軍和劉永福的黑旗軍為支援部隊的一次戰役。此役之後，在乙未抗日行動中，義軍只能配合新楚

軍和黑旗軍繼續抗日，而不再居於抗日的主導地位。(黃秀政，1992：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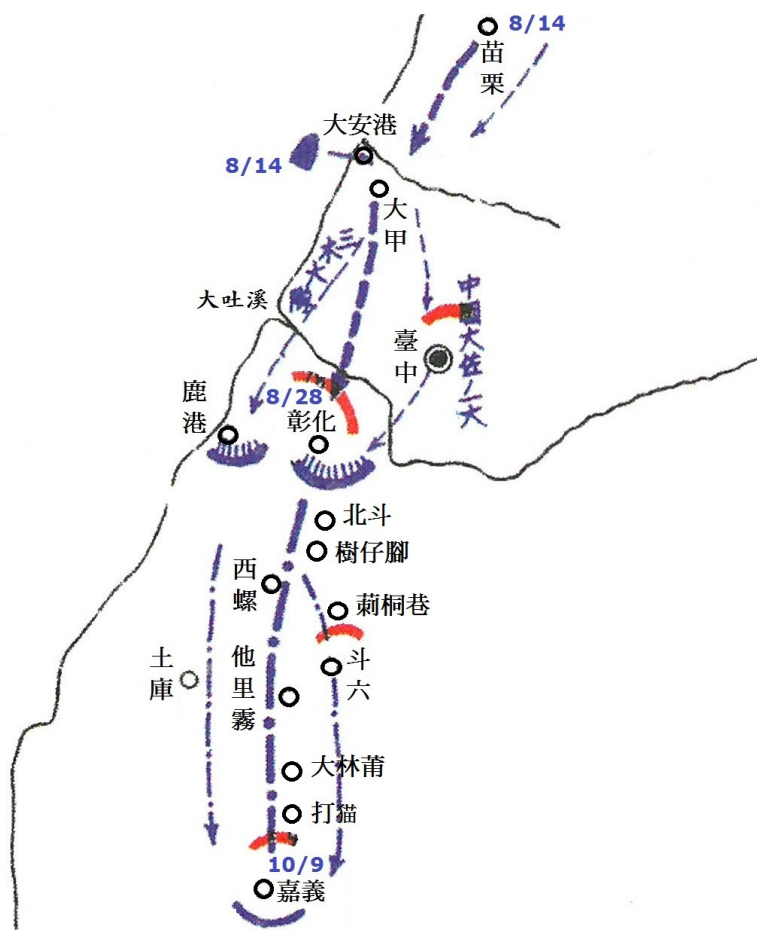


圖3 日軍南攻圖（苗栗至嘉義）

資料來源：「明治28年征臺役經過要圖」，收入呂理政、謝國興編，《乙未之役隨軍見聞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頁203。

（四）八卦山之役

苗栗一役失敗後，吳湯興、徐驤偕吳彭年「收合餘燼而逃」，

原本打算在大甲溪邊扼險紮營，以待援兵，「奈人心瓦解，全無戰志」，故撤至彰化，並飛電劉永福，請求援助。劉永福回云：「餉可向鹿紳支取，許吳湯興招募敢死軍，援兵隨至，先行死守。」（吳德功，1959：76）

日軍占領苗栗後，自8月13日起，一連休息九日，21日，方分二路向南推進，一為山根支隊長由山路進攻葫蘆墩，進至潭仔乾，再分兩縱隊，進攻臺中；另一為能久師團長離後壠，經通霄、苑里、房裡，抵大甲，（程大學編譯，1977：7）24日涉大甲溪，破葫蘆墩，攻下臺中。（連橫，1962：1036）

臺灣縣一破，彰化縣僅有八卦山可資憑仗，因此，吳彭年派王得標、劉得勝、孔憲盈、羅樹勛、羅汝澤各率一營駐守附近各庄，命福字軍一營、新楚軍一營及吳湯興、徐驥所率領的民勇若干駐守八卦山舊堡壘附近，李維義率四營坐鎮彰化城，吳彭年則率所部扼守大肚溪南岸榮光寮一帶，兵力共十二營，約三千六百人左右，（許佩賢譯，1995B：392；程大學編譯，1977：6-7）狀似布置周密，孰知8月28日，日軍趁著「弦月已沒，星光隱見，黑雲滿天」的夜裡，令砲兵及搬運步砲彈藥之軍伏六十餘人渡溪，隨即直入八卦山敵方砲臺之右後方，在東方微白，且「八卦山敵軍似尚未夢醒」之時開砲轟擊（程大學編譯，1977：7）。此役中，徐驥、吳湯興守八卦山率勇力堵，連發大砲數響，未能中的，喊聲震地。其中吳湯興手執一槍，「束褲草履，麾義民出禦，而所帶三十人為行人所擠，不得進」，最後戰死東門外。吳湯興之妻聞報，亦投水死。其勇與徐驥同奔臺南。其餘敗兵多沿山路逃往嘉義，或往鹿港方向潰逃。八卦山失守，彰化城不攻自破，知府黎景嵩遁去。（吳德功，1959：14、61、78；連橫，1962：1036；姚錫光，1967：60；陳怡宏，2019：230）攻克彰化之後，近衛師

團則因疫病所苦，暫駐彰化附近，專心讓士兵休養，但各隊人馬幾乎減半。(楊蓮福總編輯，闞正宗編譯，2014(四):80)

綜觀北路客家的抗日，有幾個面向值得注意。

其一，存在兩股不同模式的抗日行動。一則日人資料特別對桃竹苗一帶的反抗勢力做了比較，認為「尖筆山以南至苗栗間出沒的敵兵種類，完全與大姑陷、三角湧附近的土賊大異其趣」，並表示「據信的過的臺民所言，大姑陷、三角湧、中壢地方的居民是客家人，自來就是臺灣第一剽悍人種」，而「尖筆山以南的敵兵是純粹的清兵混合地方上的土匪」。(楊蓮福總編輯，闞正宗編譯，2014(四):32)以上的認知顯然有誤，其實二股反抗勢力都以客家為主，二者間的不同，只在於是否採取從官抗日的立場。

其二，從官抗日的客家愈往南愈失卻主導力量。在新竹縣尚未被日軍攻陷之前，吳湯興是民兵的主要領導人，但可能因為戰情不利及餉械的需求，逐漸由清官立場的黎景嵩，或由劉永福派赴北援的吳彭年居領導地位，加上離開鄉里，實非為保鄉抗日的鄉勇所樂見，以至於到了彰化之後，發生「吳湯興所部索餉，環府門而譁。知府黎景嵩不能制，請彭年兼統之，再電濟師。」的情形。(連橫，1962:100)

其三，北路客家的抗日，讓日本殖民政府不得不改變原本南北兩路並進的攻臺策略，以及必須增兵才得再向南推進，甚至深信必須採取無差別的鎮壓方式才得以威嚇。另一角度來看，北路客家的抗日，讓中南部較遲受戰火波及，也讓在臺南的劉永福爭取到更多喘息與布防的時間。

其四，北路客家的抗日，是日本殖民政府以「客家」認知臺灣客方言人群的開端。如《東北新聞》1895年7月6日一則「征

台軍公報」載，「大姑陷與新竹間有新募隊，此附近之村落為原義民兵，一稱客家（或曰哈客）者之集合地，其常擾害良民。」（陳怡宏，2019：79）1895年7月31日一則「臺灣之近況」之報導表示，大姑陷方面之賊稱「客家」之種族，素以剽悍猖獗著稱。客家又稱「哈喀」，土音讀為「ハ一か」。客家族乍看之下與支那人無異，然應有別於清人。客家之義，為「自他處遷來之客，其各種族昔日由廣東南部一帶移民而來，已無法得知遷來之確切時期，一說為自山東地區逐步遷移至華南地區。廣東之客家，皆為清人眼中之化外之民。客家種族於臺灣地區尤其常見，且彼等與清人不睦，故爭鬥不斷。彼等一族之居所於生蕃與支那人之間，平時從事農耕。支那人稱其為內山之客人。現下不僅清人當地民，連內山之客人亦成為吾等之敵。而擔任當地民兵者皆稱為義民。彼等之正義即為不降於日本。（陳怡宏，2019：111）皆明顯係受華南客家認知的影響，將之直接套用於解釋臺灣的客方言人群。除了客家名稱以及以化外之名，甚至以非漢視之外，也由「移墾先後」來理解這些廣東人的處境，如據某知曉臺灣情況之將校向日軍參謀本部所做之報告表示，自清國內地移住臺灣者可分三期，第一、二期移住者已皆有恆產，當時盤據大崙崁、大甲溪附近森林間的廣東人多為第三期移住者，由於移住後年月猶短，至今日未有恆產，加上個性兇狠，常組隊攜械，以闖民家、掠財物為業。並指這些廣東人在抗日失敗後，部分逃往生蕃地區，反遭生蕃攻擊，最後以贈送生蕃物品以乞得和睦相處。（陳怡宏，2018：478；2019：215-216、241-242）

四、南部客家的乙未抗日

彰化攻克之後，日軍暫止於彰化，向南虎視眈眈，戰事發展至今，駐紮臺南的劉永福成為最後一位有清朝官方色彩的首要人物。早在民主國成立當時，劉永福就被授予民主國大將軍之名號，

(史久龍，1976：21) 6月28日，臺南各界集聚關帝廟前共商大計，認為臺北已失，抗日軍事不可一日無主，遂公推幫辦軍務南澳鎮總兵劉永福繼任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劉永福雖拒之，但表示願意領導抗日，並於臺灣鎮總兵萬國本內渡後，收編萬國本所部，兼掌統轄全臺之軍事要務，於7月2日進駐臺南道署（臺灣兵備道衙門），以幫辦臺灣防務南澳鎮總兵名義，大會臺南紳民，設議會，並置籌防局，籌集軍餉。(黃秀政，1992：196-197；蔡伯壘譯，2008：119) 自此而後，劉永福一直是日軍、清國內地，乃至西人眼中主要的抗日領導者。如當時上海《申報》普遍認為臺灣的抗日行動均由劉永福領導，即使清廷上層也是如此。(陳忠純，2011：49) 直至8月13日，《申報》刊載的〈臺灣近狀〉才了解抗日的主要成員是臺地的「客民」，黑旗軍尚未參戰。(《申報》，1895年8月13日)

劉永福在臺灣南部的防務布置，計六十餘營，人數有二萬六千名左右，看似頗為周密。(程大學編譯，1977：8-9) 然據1895年9月間日本《東北新聞》引總督府某氏之報導表示，據聞劉永福在臺南安平縣一帶有十餘營兵力，然實際不過五、六營，其中劉永福親率福字軍三營，楊統領率福字副營駐紮臺南城，劉永福之子劉成良率領八營之黑旗兵駐紮旗後。9月18日的情報則表示，劉永福安排十營兵力於臺南城，六營紮於安平，包含其附近士兵約二十營，約萬餘人。(陳怡宏，2019：286、294-295、304)

表1 乙未役中劉永福在臺灣南部的防務布置分配表

嘉義以北	
王得標率七星軍七營	扼守西螺溪南岸堯平廣庄一帶
蕭三發率鎮海軍及臺南防軍各若干	扼守斗六街及土庫街

義首簡成功、簡轄革、黃榮邦、廖三聘等率義民團	扼守大莆林庄地以北區
蔡慶元	扼守北港街
臺南以北	
劉步高率軍四營	扼守嘉義
譚少宗率軍二營	扼守東石港及布袋嘴港附近
陳羅率軍三營	扼守四章湖海口至學甲寮庄一帶
柯任貴率軍三營	扼守安平港
劉永福自率軍約十一營	防守臺南及第尾港庄一帶
枋寮以北	
李英率軍約五營	防守喜樹庄及白沙崙庄一帶
劉成良率軍四營	扼守打狗海口各砲臺
劉光明率軍四營及義勇一營	防守彌陀港一帶
邱啟標率軍約三營	扼守鳳鼻頭海口
吳光忠率軍約四營	扼守東港一帶

資料來源：程大學編譯，《臺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頁 8-9。

劉永福一面派遣代表向清國沿海各省督撫商請武器、糧餉及外交上的援助，一面將中路以北的防務交由黎景嵩負責，自己則專心防備南部沿岸。其企圖主要是希望藉由列國干涉達到止戰的目的，故儘量維持現狀，避免決戰。(許佩賢譯，1995B：381) 換言之，「畫地自守」、「堅守待援」才是劉永福在乙未之際的實際堅持。(吳密察，1995：48) 而以北路客家為主的抗日行動，以及中路黎景嵩新成立的新楚軍等，由於對日軍的一路南下造成莫大阻礙，因此拉長了臺灣抗戰的時間與空間的縱深，此亦劉永福能夠在臺南「堅持」到 10 月下旬最重要的原因。(吳密察，1995：46)

劉永福的態度是畫地自守，在日軍未挺進其防區之前，不輕易調動軍隊往援他人，因此對於臺中地區黎景嵩的請援遲不理會，且在彰化陷入危局之時，一再要求黎氏堅守，如8月18日，劉永福致函黎景嵩，言「雖失大甲，務死戰，生死何惜，盡人聽天，援兵日進，雖未立到，不懷一點懼心，氣勝則勝。」22日復言「須在彰化調度，勿率軍南來，糧餉輸送勿患。」23日言「糧餉從七里（地名）持送，若抵達，務必於營務處領取，共體時艱，盡職緊守，彰化惟賴兄與營務處。」（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四）：407-408）24日黎景嵩致函劉永福表示，「彰化城危在旦夕。弟空拳隻手，兵餉兩欠」，「弟一人實力盡心碎，日日望臺南之兵餉到，或能挽回，而既遲，不問大局既壞，弟唯聽天盡力。」「閣下若不早來，彰化即將拱手讓倭，承痛詢，望晝夜兼程來。」（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四）：409）黎景嵩終究等不到劉永福的積極增援。但彰化陷落後，劉永福成為日軍的首要假想敵，已難觀望或拖延，必須正面採取抗日行動。在此階段，北路隨官敗退下來的徐驤，以及南路六堆客庄也積極配合，協助作戰。以下的討論，以六堆客庄的抗日行動為主，分為隨官抗日與在地抗日兩方面說明。

（一）六堆的隨官抗日

由既有文獻資料來看，乙未之役中，六堆客庄隨官抗日應有二股不同的行動。一是六堆自行隨官抗日者，二是響應外人抗日行動者。前者據日方資料顯示，六堆曾應劉永福的召募，駐屯在打狗附近，負責沿海守備，但因當時南部尚無危險，加上糧餉補給困難，暫時歸庄待命。（許佩賢譯，1995B：396）這個記載可由光緒21年7月初10日（8月29日）駐守旗後砲臺統福字軍各營的劉成良發給六堆各總副理的札文內容中得到印證。該札文稱，「照得現在庫款萬難，鳳屬籌防分局均經裁撤，而各庄義勇亦應

一律撤回歸農，俟有事時即行調出，……六堆義勇雖然暫行撤回歸農，務須留堆聽候本統領隨時徵調，併仰各堆總副理出具甘結，如遇緊要事時，各堆義勇隨調隨到」。(吳密察編著，2015：43-44)若參照松崎仁三郎著《嗚呼忠義亭》中稱，「光緒 20 年（1894）陰曆 5 月，劉河乘六堆義民被清之欽差劉永福召集之際，聚集附近的匪徒襲擊住在六龜閩族醮安〔詔安〕客十餘戶，肆行掠殺」，（松崎仁三郎，1935：96）推測這次六堆受命駐屯打狗附近，可能始於乙未之役初起的清曆五月。

約此同時，光緒 21 年 5 月 30 日（6 月 22 日），劉永福曾致「統領飛虎新苗各軍前任臺灣總鎮」吳光亮照會，表示「貴鎮駐守新苗兩處，臺北情形較易探聽，如果該處兵力卑薄吃緊難恃，則請移駐臺灣府城，再添營勇，以固半壁。當此時勢，碍難守株而不變通，亦無庸請示，致多轉折」。(陳怡宏，2016：442-443)上述之照會約於同年閏 5 月初 6 日（6 月 28 日）始送抵吳光亮處，當時日軍才攻克新竹城，中北部防務尚須積極應付，但劉永福已為南部防務打算，欲以吳光亮駐守臺中，「以固半壁」。

9 月 4 日劉成良致函其父劉永福，提及「男聞大人欲調粵籍義勇赴郡」，顯示到了彰化陷落，日軍對南境的威脅日盛之際，劉永福又打算再度調召六堆客民。劉成良於該函中建議可以調召瀾濃庄一處的粵民，「較為近便，不過半日、一日，儘可到郡，別處粵籍太遠」，且「該庄極大，粵人最多，比各庄多之數倍，約可調得一二千人出，又頗善打仗。惟該庄窮人者甚多，因苦無力籌伙食，又苦於軍械少耳。若公家肯招呼餉械，粵人甚為得力，尚勝於外江營盤百倍。男查訪粵籍客人善於埋伏、長於穿山、抱抄〔包抄〕敵人後隊云云。若擇粵人明白本事得力者，派一統領之權予他，定必能出力成功。況臺北彰嘉一帶，多係粵籍人，伊輩若聞重用，粵籍定多歸心，向義急公矣」。(吳密察編著，2015：93-94)然由

9月13日劉永良致劉永福函中稱，「有五溝水總理劉維新，帶同義民數十名到旗後稟稱：『奉諭調赴郡城防範，李向榮、蕭光明，隨後始到。特此具稟。先飭維新，赴轅聽候調遣。』」（吳密察編著，2015：78）則可知此次並非調召瀾濃粵庄的客人。而此次徵調六堆，似乎也未成功。因為據《嗚呼忠義亭》載，六堆大總理李向榮率六堆軍一千餘名，向鳳山城出發時，受阻於下淡水溪洪水，在河岸滯留三日，因此無法如期趕赴鳳山縣。鳳山縣因為已將義民未到之事向道台報告，故令客民回庄防守。返堆後大總理、副總理因遭非議而引咎辭職，大總理、副總理改由邱鳳揚、林光福繼任，鍾發春仍任總參謀。（松崎仁三郎，1935：132-133）

10月10日，劉成良再次發札文給六堆粵籍總副理李向榮、蕭光明等，提及劉永福於9日命令「速在鳳山調粵庄義民一仟名，不分兩夜，即來郡守城。在旗可先發伙食，令其速行，月前仍由彼庄內自備，我惟出伙食而已。仰即遵行辦理，毋得違延。」（吳密察編著，2015：72-73）然此次即使「事關軍務緊急」，六堆因聞日軍即將於枋寮上岸，也未能派庄民赴援。

除了前述六堆自行隨官抗日外，在南部戰局日見緊張的階段，亦有六堆客家響應外人抗日行動者，由已有文獻來看，六堆客家可能曾由蕭三發、徐驥二人領導參與抗日行動。此論點依據之一，據邱福盛，〈六堆同胞孤軍抗日血淚史〉中載，乙未之際，有內埔鍾恭信、長興邱阿榮等，招了五六夥趕赴雲林斗六地方殺敵，是六堆民眾零星抗日的開始。（鍾王壽主編，1973：104）另據宋子鰲《隨筆雜記》中，稱其父宋安邦曾於乙未之際，投軍於劉永福麾下，「劉提督一面加強訓練軍隊，一面授命統領蕭三發組織團練，以備禦敵。先父痛感世事遷移，慨然投筆從戎，糾合鄉勇，投軍於提督劉永福將軍麾下，編入團練」，「蕭統領率精銳之團練壯勇，屯駐濁水溪之南，與日軍會戰」。（許秀霞，2011：165）

另徐驤的部分，據洪棄生稱，「徐驤自彰化失後，所部僅存二十人，至斗六，參民團戰，即走臺南，劉帥亟獎之，命入蕃薯寮、打鹿埔一帶募軍。餉械缺乏，止收三百人」。(洪棄生，1959：17-18)此說法與連橫、姚錫光認為，八卦山之役戰敗後，徐驤即往臺南走，獲劉永福慰勉，且命其入卑南募兵，「得七百人，皆矯健有力者」，劉永福命為先鋒營，以之馳驅前敵，駐斗六溪底(連橫，1962：1037；姚錫光，1967：63-64)的說法稍有歧異。但若是往蕃薯寮、打鹿埔一帶募軍，則有可能募到同方言的客家，而鍾王壽《六堆客家鄉土誌》亦稱，徐驤曾至屏東客庄召募生力軍。(鍾王壽主編，1973：227)

(二) 六堆的在地抗日

8月29日，日軍南進軍自彰化發動攻勢，分三路向西螺溪以南進攻，9月6日進占西螺。7日陷他里霧、土庫。後有部分日軍越老尾溪，蕭三發、徐驤、簡成功、簡精華各率隊據牛厝灣庄及斗六一帶抵禦，勝之，後遭日軍全力反擊，乃潰敗。(陳漢光，1948：143-145)

日軍占領彰化後，在該地停留月餘，係因自南侵以來，遭遇臺灣官民頑強抵抗，兵力損失匪鮮，且水土不服，病患日有增加，乃急向本國求援，故陸續增調第二師團及混成第四旅團、混成第七旅團來臺。是時，在臺兵力已增至九萬餘人，乃命臺灣副總督陸軍中將高島鞆之助，編組南征軍，並於9月23日擬定分由三路的進攻臺南的計畫：1.陸路南進部隊：由北白川宮親王統率近衛師團，自彰化前行，沿途平亂，南下至嘉義一帶鎮壓。2.枋寮附近登陸部隊：由乃木希典中將統領第二師團，自本島南部枋寮登陸，前行掃蕩，北上自鳳山一帶進逼。3.布袋嘴附近登陸部隊：由伏見宮貞愛親王統督混成第四旅團，由海路前進，於布袋嘴登陸，自

西方側面進擊。（程大學編譯，1977：9-10；徐國章譯註，2005：5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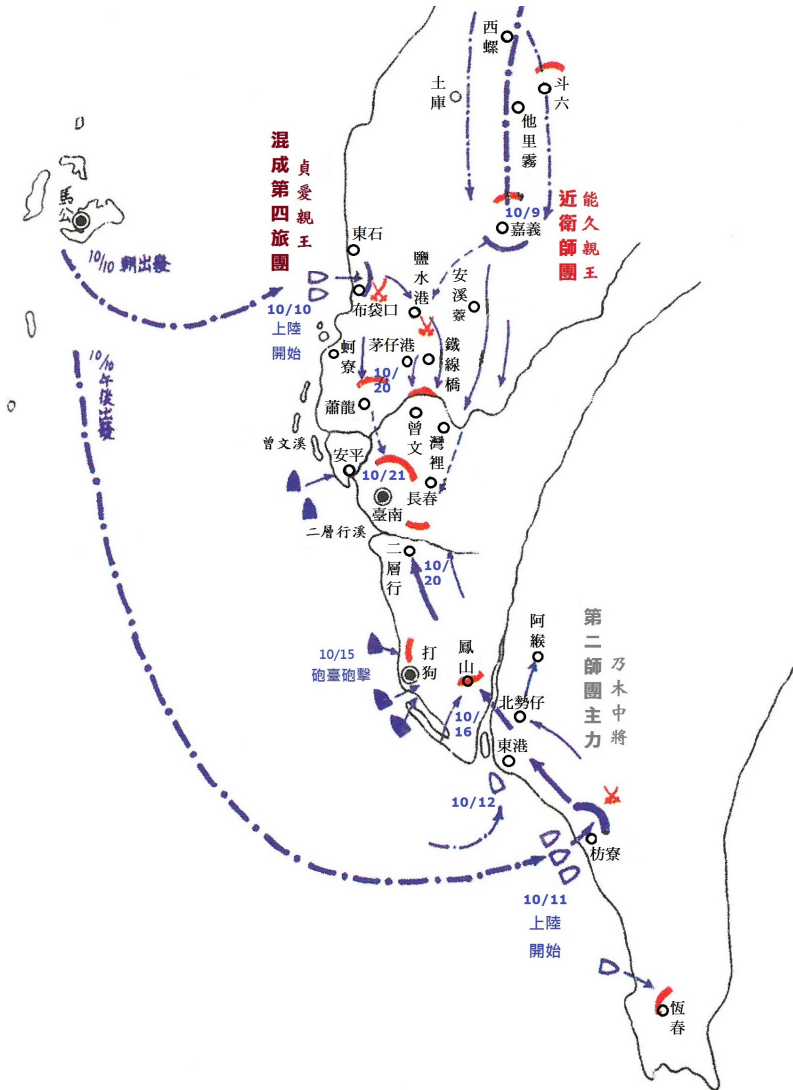


圖 4 日軍分三路進攻臺南

資料來源：「明治二十八年征臺役經過要圖」，收入呂理政、謝國興編，《乙未之役隨軍見聞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 年），頁 203。

10月6日，雲林統將王得標、義民簡義、生員徐驥等與日軍戰於他里霧、雙溪口，敗績。（吳德功，1959：67）7日，日軍攻陷雲林縣。黑旗諸軍退入唵古坑。是日徐驥紮在斗六溪底，王得標率簡義分紮斗六街外村落，以細碎鐵裝砲攻擊。（吳德功，1959：67-68）斗六陷後，義軍各營撤至大莆林。日軍於10月8日攻至大莆林，蕭三發、黃榮邦、黃義成及簡氏父子率隊再戰，蕭三發、黃榮邦戰死，日軍續陷打猫街。（陳漢光，1948：145-146）9日，攻入嘉義城。10日，混成第四旅團先頭部隊在布袋嘴登陸，但因風浪甚急，至11日才全部登陸完畢。

10月11日，乃木希典指揮的第二師團抵達屏東枋寮外海。日軍在登陸前，已接獲情報了解「枋寮、鳳山之間有若干客家賊」，但卻萬萬料想不到會在那裡面臨激戰，也是第二師團登陸後的第一場戰役。（陳怡宏，2019：393、458）日軍登陸後，在北勢寮及枋寮的恆興營往恆春方向潰走，在埔頭的忠字防軍前營則因受艦隊砲擊及日軍攻擊，往北方潰走。由於屬於六堆中左堆的茄苳腳，位於東港、枋寮間的中樞，且係通往番地的十字路站，日軍認為若不陷茄苳腳，則無法前進東港，也無法退守枋寮，因此將茄苳腳視為必須攻占的目標之一。其實茄苳腳庄中，曾任六堆大副總理的蕭光明在日軍攻入之前已得知消息，故馬上「飛檄請求友庄來援」，並將四門緊閉，嚴加防備。當時全庄約1,400餘人，火器只不過火銃15挺、步槍一百二、三十挺。（許佩賢譯，1995A：361-362；許佩賢譯，1995B：404）



圖 5 渡河進擊茄苳腳之日軍

資料來源：《風俗畫報》第 105 號，臺灣征討圖繪第四編（東京：東陽堂，1895 年 12 月），不著頁碼。

當時受命占領茄苳腳的日軍第二師團步兵第四聯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由於開至茄苳腳庄的途中一片靜謐，原以為只是一座孤村，但前進至五百公尺時，「發現敵人多至約二、三百人之間」，並自矮牆上的槍眼猛烈射擊，日軍齊向前衝之後，才發現聚落前有一條「寬約四、五間」，「水深達腹部，且泥濘沒足」的壕溝，陷入騎虎難下之境，復遭聚守其內的民兵以熱水澆灌，因此久攻不下，且死傷愈來愈多，彈藥逐漸缺乏，只能將身體潛入溝中，暗兵不動。（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六）：35-36）後經另有任務的第一及第十二中隊折返茄苳腳支援，兵力大增，停泊於枋寮外海之八重山艦亦開砲射擊，才得以逆轉戰局，民兵不支，「留下舊式大砲十二門及小槍等其他器械，全數往恙園及海岸

潰走」。日軍占領茄苳腳後，發現「敵人死者約八十餘名」。後續登陸的步兵第十六聯隊則經下埔頭、半見庄，亦進入茄苳腳。而接到蕭光明求救檄文的其他各堆，雖由先鋒堆總理林芳蘭、上前堆總理邱維藩、下中堆總理李鎔經、後堆總理邱毓珍等率千餘人來援，卻已來不及，只好中途撤退。（許佩賢譯，1995A：361-362；許佩賢譯，1995B：405；陳怡宏，2019：404、433-434）

James W. Davidson 當時也親眼見證了這場戰役，他形容道「竹子的爆燒的聲音，房屋之倒塌隨同這可怕的火的吼聲漸漸迫近戰慄的兵勇們，他們與老百姓被迫由其隱匿之民屋走出來，其情形是緊張萬分。喧囂聲中可以聽見華人之哭聲，這些可憐的人們蹲伏爬行，漸近石牆，利用地坑及在悶燒的樹木俾使其不為火炎之炎熱所侵。終於無法再忍下去，恐怖狂叫，他們投向石牆，然後向北方之叢林狂跑」，並表示此役中，日軍損失 77 人（死 16 人，傷 61 人），其中軍官 3 人，「這是在臺灣日軍蒙受之最大損失」。（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245）⁵

⁵ 《日清戰史》則記載，「此役日軍 604 員參與，其中丸山重吉少尉戰死，尾崎清治少尉受傷，下士卒 14 名戰死、56 名受傷，消耗子彈一萬餘發。據說民兵有 80 餘人死亡、20 餘人受傷」。許佩賢譯，《攻臺戰紀——日清戰史·臺灣篇》，頁 3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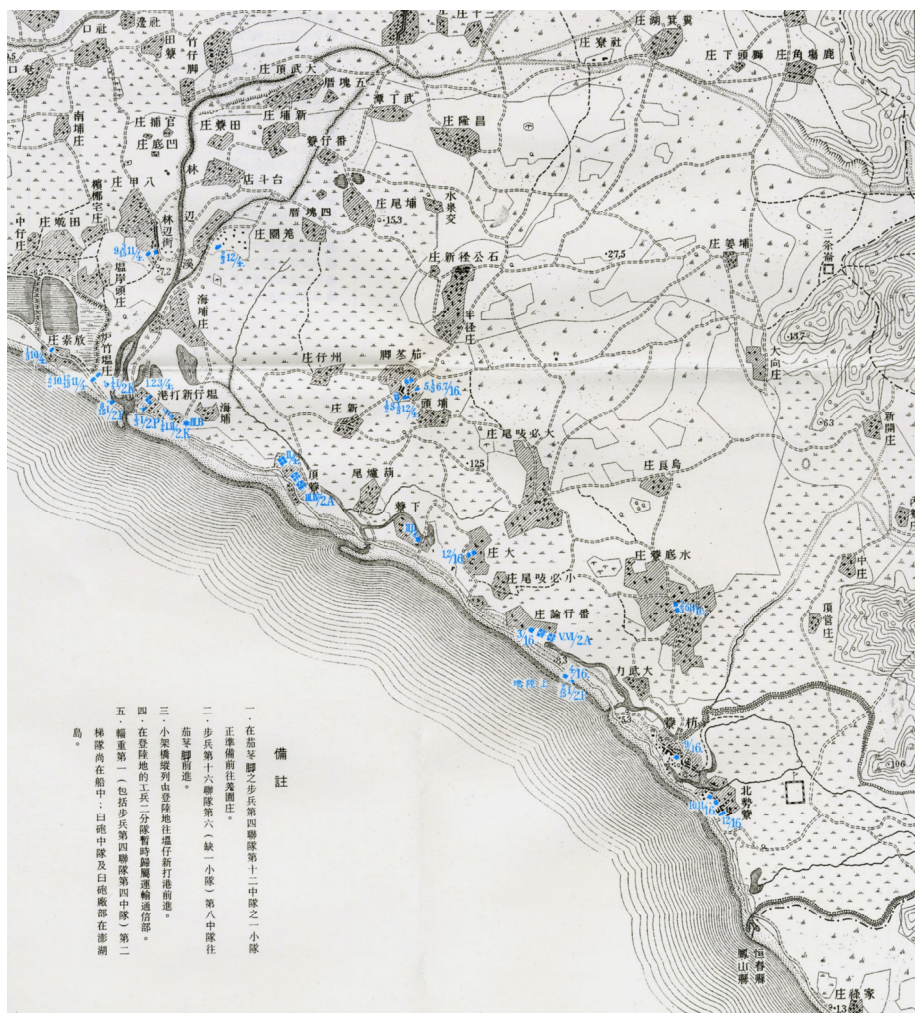


圖 6 第二師團枋寮附近上陸位置圖

資料來源：「日軍攻台戰鬥地圖」，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 (2016/3/3 點閱)。

當日，駐守東港的忠字防軍營管帶吳光忠，因得知日軍攻陷茄苳腳，乃不戰而逃，於是日軍在沒有遭遇抵抗的情形下攻占東港。(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六): 54-55) 10月12日，日軍前衛在新街庄附近宿營，派前哨至烏龍庄及鹽埔仔庄一

線警戒。並於翌日早晨，派兵偵察萬巒庄方向。之後則沿著東港溪及其支流頓物陂前進，於當天下午抵達屬於六堆先鋒堆之頭溝水庄西方。由於看到該村一端有一批清兵及數面黑旗，遂往前進占萬巒庄外緣。(許佩賢譯，1995B：323) 入庄後方知該批清兵乃原駐東港之忠字防軍中營、後營之總領吳光忠，其於 12 日傍晚率領二百名殘兵離開東港，進入頭溝水庄，與埔頭的敗兵會合，準備投靠六堆。然而，六堆客庄因「厭棄清國兵的怯懦及不守規律」，未予厚遇，於是吳光忠決定改向日軍投降。13 日，在頭溝水與日軍表示降意時，因雙方無法溝通而發生衝突，終於潰亂而去。而頭溝水庄附近六堆各庄民聽到此衝突聲，便鳴鈺擂鼓嘯集壯丁九百餘名，先鋒堆由林芳蘭總理指揮，由萬巒庄方向；下中堆由李鏞經總理指揮，由新街庄；後堆由曾維彬副總理指揮，由忠心崙庄，三面逼近頭溝水庄，與日軍交鋒後，不敵而去。(許佩賢譯，1995B：405) 日本《東北新聞》報導南進軍戰況時則表示，10 月 14 日第二師團所派右側支隊一大隊與一中隊之偵察隊在頭溝水庄「遇敵軍五百，並擊退之」。(陳怡宏，2019：369)

第二師團主力進入東港後，駐屯鳳鼻頭附近各營望風解散，駐屯打狗附近諸營也因糧餉罄盡，極其饑困，毫無鬥志，15 日，日軍以艦隊砲擊打狗砲台，在未遇特別抵抗的情況下輕鬆占領打狗，劉成良逃往臺南。從枋寮至鳳山途中則歷經數回交戰，16 日在鳳山附近與約三千民兵交戰並擊退之，於是打狗、鳳山以南一帶遂全歸日軍占領。(許佩賢譯，1995B：405；陳怡宏，2019：370) 由於南進軍的三方面部隊都已向臺南集中，南進軍司令部於 10 月 17 日排定向臺南進逼的行軍計畫。(曹永和、吳密察編纂，1986：552-553) 19 日，日軍以一旅團兵力由混成第四旅團長貞愛親王率領，分兩路南進，一路攻曾文溪，一路攻蕭壠。20 日上午，日軍渡曾文溪，入侵東勢宅庄，與駐屯於此的徐驤對戰，徐驤阻日軍

於曾文溪支流東岸。時日軍以砲轟擊文溪庄，守將柏正材、王德標均率所部迎戰，迫退日軍。後日軍由旅團長貞愛親王親率旅團本隊由兩側夾攻，騎步並進，砲火熾烈，徐驤中砲而死，柏正材繼亦陣亡，抗日軍潰不能支。(黃秀政，1992：244) 20 日傍晚，有英國傳教士及教徒至第二師團前哨稱劉永福已於前一日搭船自安平離臺，請日軍進城安民，因此，日軍於 21 日晨在沒有抵抗下進入臺南城，南進軍司令部亦於翌日進城。(曹永和、吳密察編纂，1986：552-553；陳怡宏，2019：418)

南進軍司令官高島鞆之助於 10 月 22 日進入臺南城後，即電樺山總督報告臺灣南部平定，稱「本軍日昨已佔領臺南府，爾後雖尚無以確切保證，無殘兵或土匪糾合滋事之虞，但大略可稱已完成平定臺南臺灣地區」。26 日，樺山總督攜同臺南民政支部人員隨行，經海路進入臺南。樺山認為，雖然當時蕃地之外尚未占領恆春、臺東地方，且濁水溪以南各地雖有部分「殘賊尚存餘息」，但推斷已無糾眾團結之跡象，故暫時判定臺灣全島大略已平定。將來之戡定工作以第二師團及現有後備兵已足以應付，乃決定讓征戰已久的近衛師團凱旋回國。(蔡伯壘譯 2008：268) 26 日，第二師團奉命擔任大肚溪以南的守備工作。近衛師團則於 11 月 13 日起由高雄港分批返日，此時距離 5 月 29 日登陸澳底恰好整整 5 個半月的時間。(鄭天凱，1995：137)

然近衛師團回日本之後，臺灣的治安並沒有如樺山所預期的那樣樂觀，日人宣稱平定全島，卻忽略了下淡水地區的六堆客庄。如 Davidson 所言，頭一個困難問題發生於 1895 年 11-12 月間，「似乎與在島之極南方的客家人有關」。(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252) 而就如臺南的傳教士在日軍進駐臺南後的記事中提到，「在南路靠山的客家人尚未全部接受日本統治，所以日本士兵到那裡進攻」。(陳怡宏，2016：435)

由於第二師團主力從枋寮登陸後，急於向臺南推進，雖在茄荖腳及頭溝水庄有幾次戰鬥，但也沒有特別注意生息在淡水溪左岸一帶平原的六堆粵族。六堆中首先被征撫者在右堆地區，10月23日，臺南地方守備隊的中埔駐屯隊在牛埔庄（屏東市牛埔）附近進行討伐工作，以眉濃庄為中心的右堆各庄全部歸順。（許佩賢譯，1995B：359-360）

駐屯鳳山的仲木第四聯隊長因察覺散布在鳳山、枋寮間的「客家賊徒」有反抗舉動，故派兵前往偵察。11月10日，日軍偵察隊經阿猴抵歸來，得知歸來與鄰庄麟洛因一為閩庄一為粵庄，彼此向來不合，甚至兩村間無路可通。待日軍偵察隊進入麟洛庄後，發現該庄「以土牆將全村包圍起來，牆上設有槍眼，宛如一個城郭」，但庄民都在牆上掛起白旗，「家家戶戶都貼著歸順的白紙」，甚至在衣襟上縫著寫有「順良之民」的布片，民情看似穩定。但當日軍偵察隊抵達新圍庄（屏東縣鹽埔鄉內）南端西勢河畔時，發現一隊約好幾百人的白衣兵由麟洛庄向北方展開，才發現是之前「簞食壺漿歡迎我軍的麟洛庄庄民」，日軍被誘入，且遭人數多數十倍的庄民圍攻，「根本顧不得腳下踩的是田園還是草原，是道路還是田畦，且戰且走，敵兵從前後左右群集包圍射擊我軍，子彈飛來飛去，宛如四面八方皆是敵兵」，撤退時「無確定方向，也不知會抵達何處，只是不自覺地往西方走，經過十數條河川」，才終於又回到阿猴街。此次偵察行動，造成3名兵員死亡，下士以下2人受傷，其它行蹤不明者2人。（許佩賢譯，1995A：437-439；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六）：418）

11月11日，鳳山地方守備隊復偵悉六堆以大總理邱阿六為首，在西勢庄集會，且得到四十餘庄支持。第二師團長接獲此一報告，18日決定以山口少將（步兵第三旅團長）率南征支隊，負責剿滅「下淡水溪西勢庄附近的賊徒，及鎮壓直至加冬腳間全境

的客家地方」。(許佩賢譯, 1995B: 359;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 1895) 23日, 此南征支隊在鳳山附近集合, 翌日行經磚仔礮, 向西勢庄附近前進。面對日軍已強勢控制全島重要城鎮的當下, 六堆對日是和是戰, 內部其實幾經爭執, 六堆正副總理曾依例在西勢忠義亭集會, 討論和戰問題。最終決定斷然抵抗日軍, 「刀折矢竭, 死而後已」。11月24日並飛送檄文至遠近各庄, 內稱:

我粵先世尊舉義旗, 籌餉籌兵, 兵由談賦出, 餉由田甲供, 懷忠古里獨存義民。先世近聲有無知之輩議曰, 臺地割倭人, 盍不歸倭? 孰不知皇朝未下議和之詔, 百官未懸割地之書, 我粵世世稱忠義, 奉清朝正朔, 惟知中國之帝王, 斷不敢懷二心, 更不事異類。況倭到處焚書坑儒, 欺神滅像, 宮室宗廟無一存, 雞犬牛羊俱殺, 廢人尸骸, 辱人妻女, 強奪財產, 殺無辜, 總兇殘不勝數。篡國之賊, 盜賊之行, 我等氣撼風雲, 志安社稷。……今伊始若有粵人私自降倭者, 倭至而退縮不驅者, 均以私通賊匪, 罪當擬斬。為曉諭大眾, 為此布告。六堆者孰非大清臣子, 或膺累朝之寵命, 或受先帝之宏恩, 盡忠報國正此時矣! 向義勤王是吾本願, 盟猶在耳, 忠豈忘心。請看今日之事機, 定復中華之土地, 特承各庄運經理額旗一竿、軍米二十斛、鉛碼四十斤至中軍營封固, 以便應軍。如未開仗, 依原樣交還。承先鋒旗手預備軍裝鉛藥, 嚴防要隘, 聽候應援, 切切, 勿違。(楊蓮福總編輯, 闕正宗編譯 2014 (七): 351-352)

11月25日日軍先在阿猴街東門集合, 再往攻火燒庄。下午三時半向該庄靠近時, 遭庄民「從圍繞村周圍竹林所建的堤上, 以大砲小槍不斷射擊而來」, 日軍則以砲回擊, 鏖戰良久, 日軍因受阻於庄民「以濠溝圍繞, 濠溝內插竹尖」的防禦工事, 遂以火攻。由於日已西斜, 日軍於傍晚六時全軍退回阿猴街。(楊蓮福總編

輯，闕正宗編譯 2014（七）：357）



圖 7 日軍攻火燒庄情形

資料來源：《風俗畫報》，第 111 號，臺灣土匪掃攘圖繪第一編（東京：東陽堂，1896 年 3 月），不著頁碼。

26 日正午，日軍以優勢武力再次向火燒庄推進，雙方對戰多時，日軍終在下午四時完全占領火燒庄。日軍稱「當日與我們對陣最獐猛的土匪，其數約一千五六百名，指揮官為林阿福、邱阿六」，日軍於此役「殺死三百餘人，據獲舊式砲約二十門、小槍三百餘挺、矛槍百餘枝、彈藥若干」，「而火燒庄正如其名，幾乎化為灰燼」，之後復沿庄民退走路線，陸續焚燒老潭頭庄、新潭頭庄、歸來庄、崙上庄、香椽腳、三塊庄等地盡是火海，（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七）：362-363；蕭英伸譯，2004：117-118）此役是 1895 年乙未戰爭最後一場大規模戰役。（根誌優，2012：186）據日方的資料表示，由於「火燒庄附近的賊庄付之一炬，被

日本軍屠殺的飛報已抵達客家賊的各庄，到處惶恐狼狽，突然表恭順之意，豎白旗，乞歸順者不斷」。(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七):367) 29日，一小支日軍在萬巒庄遭到約二百名庄民來襲，30日派兵至萬巒庄拘捕庄內知名者十餘名，(許佩賢譯，1995B:361；蕭英伸譯，2004:120) 12月1日，滯留萬巒庄進行偵察訊問，發現其中林阿連、林阿八、賴冉貴、林添由等人「不只是賊魁，且又無歸順之意」，於是召集庄民並在其面前將此四人斬首，日軍的紀錄表示，四人「臨死皆從容自若，為他處罪徒少見者」。(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1895；蕭英伸譯，2004:120) 當天，部分日軍在茄苳腳與恆春地方守備隊取得連絡，完成此次征討客庄的任務。日方資料表示，經此次討伐，「使慄悍的粵族為之喪膽，許多閩族及熟蕃等也望風披靡，前來我軍營獻上武器，立誓歸順，該地也終於歸趨平靜」。(許佩賢譯，1995B:361) 12月3日，六堆總理邱阿六親自到南征支隊投降歸順，日軍司令官表示免除其罪。4日日軍從萬巒庄出發，經內埔、新東勢、磚仔礮等地，於9日歸抵鳳山。(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1895) 10日邱阿六再率舊部到日軍司令部謝恩，日方在接見時，除了說明臺灣島已歸為日本領土，並諭示在日本政體下，客家屯田兵體制不可稱為六堆。(蕭英伸譯，2004:112)

五、南北客家抗日原因與特色

客家在乙未之役的行動，或可由日方的觀察略窺一二。一則〈土兵の逆襲〉報導中，比較了新竹地區的福建與廣東移民，表示「福建人擅商業營利」，但「只是所謂中國人根性之徒，無抗我之氣慨〔氣概〕，實不足賴」，而「廣東人多半從事農業，慷慨悲壯之士不少」。(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二):176) 乙未之役時以隨軍攝影師身分隨近衛師團來臺的遠藤誠在提及新竹縣附近抗日的民兵時，表示：

新竹縣附近之居民係從清國福建、廣東兩省遷移而來，福建人善於經商牟利，廣東人則多從事農業，有不少慷慨悲憤之士。廣東人雖少於福建人，但凡男子無不入義勇團，脅迫福建人提供糧食軍資，靈活出沒各地，發現我軍寡少便突然來襲，一知我軍有優勢即離去，假扮成在田野工作的良民，故土兵就是一般民眾，其數甚多，我軍之苦戰實非偶然。（呂理政、謝國興編 2015：122）

日軍征討竹苗地區時，曾有中港的福佬致日軍稟文，稱客家為「土匪」，「前聞大兵到新竹，百姓皆壺漿以迎，罔料頃在老衢尖崎筆山等處，土匪糾黨數千，假稱義民，沿途槍殺，時出田園，刈盡早稻，掠慘不可言。不唯逞掠慘耳，迫脅在地良民，強籍義民之黨」。（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三）：68-69）而相對於客家的積極抵抗，其他非客家地區的平和對待，更讓日軍或隨軍記者有相當不同的感受，如表示「苗栗以南的居民與冥頑不靈的大姑陷附近的居民不同」，或言後壠「以赤心歡迎我軍，或贈禮物，或任軍隊嚮導」，大甲人民「歡迎厚待我兵，居民極為平穩」，葫蘆墩之居民「獻果豎旗以表歡迎之意」，或言刺桐港以北及海岸道路番控街以北平穩，尤其是海岸街居民「款待我甚厚」，海岸道路幾乎沒有敵兵，布袋嘴的居民「未對我偵察隊懷抱惡意」等等。（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四）：37-38、53、72、376；陳怡宏，2019：253）凡此，讓人不禁好奇客家在乙未之際積極抗日的可能因素。

（一）客家抗日的可能因素

1. 保衛鄉土

在乙未之役中選擇抗日立場，保衛鄉土與既有產業應是最原始且重要的原因之一，如 1895 年 9 月 7 日《東北新聞》一則「臺灣通信」的觀察，提及臺北以南土勇頑強之理由，與當地百姓重視土地有著密切關係。報導中提到，此等當地民之父祖等來到大姑陷附近，與棲其地而居之土蕃，數年間濺鮮血將其逐至內山，而後開拓墾殖以傳子孫。而割臺之議既成，屢有傳言「日本人將悉數沒收其土地」，「流傳於彼等之間，因而非常驚愕與失望，最後終至自稱義軍，決死抵抗我軍」。（陳怡宏，2019：210）

或如吳濁流所言，「當時的抗日戰爭，是自發的，而不是有組織，有系統的」，「躊躇不前，村莊就會被日軍強佔。被佔了就完了，在被佔之前，非戰鬥不可，於是臺灣人受這種感情所驅使，一齊站起來，在各村各自勇敢地奮戰」，「因此，聽到有日軍來臨，便湧起抗日的感情，產生抗日的思想，變成抗日的行動」。（吳濁流，1989：38-39）吳濁流提到他所認識的「文進伯」與一位村中覲公參與抗日的例子，「聽到日軍來了，拿起種田人切田藤的劈刀，和村中的壯丁們，一齊馳赴涼傘頂。但是，當日軍打來的子彈，飛過他們的頭頂時，他驚異之餘，狠狠地逃了回來」。村中的覲公則是「頭上纏了紅布條子，手中拿著牛角，舉著紅旗，以奇怪的姿態，到涼傘頂參戰」，後來因為「日軍從山上向那紅旗集中射擊，覲公便丟掉旗子逃走」。「戴著有色眼鏡的今天的歷史家，對此會有種種的解釋吧。會說是漢人魂，或是民族意識吧。我不這樣想。和自己的村莊，受到強盜的侵襲一樣，任何份子都有防衛的責任，聽到強盜來了，甲也好乙罷，都為了保衛村莊，傾巢而出，合力追捕匪徒，是同樣道理。」（吳濁流，1989：35-36）

2. 從官殺賊、助官平亂的義民傳統

在乙未之役中，南北客家都有從官抗日的行動，此與清代以來粵民多助官平亂的義民傳統有關，但卻不能一律視為義民傳統之慣性。且若比較乙未之役南北客家助官平亂的行動，可以發現，南客助官平亂的次數、規模都極少，且對戰局的影響不大，比較是以在地堵禦的方式參與乙未抗日。北客中的竹苗客家在乙未之役中較多從官平亂的行動，然由自主領導到受制於官，由在地堵禦到離鄉背景，終至客死異鄉，南北客家的乙未抗日，在此面向有相當顯著的差異。也由於北客的從官抗日，使其抗日行動由新竹、苗栗、彰化、雲林、嘉義，一路南下，呈現動態的抗日樣貌。南北客家在這方面的差別，應主要是由於地理位置的不同導致面臨不同的戰局變化所致。

3. 對新統治者的疑懼

改朝換代之際，最重要的意義是代表「外來者」（日本人）的侵入，而對於「外來者」侵入所抱持的不安應該也是影響抗日行動的重要原因。（吳密察，1995：40）6月初，Davidson 在滬尾看到紛紛打算逃離臺灣的民眾，即表示「他們之所以如此逃避，並不是因為他們真正了解為日本人統治之可怕，而是當時的情勢是非常神秘可疑的緣故」，由於官府只作籠統的宣傳，「說倭奴非常兇惡，會搶劫婦女，殘殺兒童，使臺灣人都做奴隸」，用這種方法在富人之間引起恐慌，使窮人不得已去當兵打仗。（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187）或如前述吳湯興招募義軍的佈告稱「臺北已陷於倭夷，土地人民皆遭其荼毒。聞倭奴佔據後，則田園要稅，房屋要稅，人身要稅，甚而雞犬牛豬無不要稅」，六堆的檄文稱「倭到處焚書坑儒，欺神滅像，宮室宗廟無一存，雞犬牛羊俱殺，廢人尸骸，辱人妻女，強奪財產，殺無辜，總兇殘

不勝數」等，都讓客家心中難免疑懼。當時在臺的西人也認為，由於「黑旗首領及中國官吏之嗾使，鼓動客家及生蕃之（民族）精神，以致對日人之憎惡心理已根深蒂固」。（程大學編譯，1977：87）或認為「於是未曾接觸一名通譯人員之客家，自無從辨認真相，認為若要犧牲於殘忍極惡之倭奴刀下，失散父母妻兒，不如決意暴白骨於戰場為忠潔」。（程大學編譯，1977：86）再如前述臺北府電信局員 Han Seu 於 6 月 6 日即預知日軍將在臺北以南遭遇困難，「因在該地有土民及廣東人之故」，其如此推斷的依據，是認為這些人有「離不開該地之苦情」。（程大學編譯，1977：34）離不開土地，面對外來者的疑懼大概就只能用抵抗來面對。

4. 維護舊制的思想

由武裝抗日號召中多有標舉效忠清朝皇帝的事實來看，在政治層面上，客家的乙未抗日多少具有效忠滿清朝廷的取向，翁佳音將之名為「反日復清」，並指出這不是受西方影響的近代意義之民族運動，而是與義和團保清抗外一樣，是「中華之民不服夷狄之治」的效忠清朝體制的思想表現。（翁佳音，1986：137、139）此一思想在乙未之役中的南北客家中都可以看到，如吳湯興的佈告稱，「爾等踐土食毛，盡數天朝赤子，須知義之所在，誓不向夷」；六堆的抗日檄文稱，「久奉清朝正朔，唯知中國之帝王，斷不敢懷二心更事異類」。此類思想尤多見於次級領導階層的文武生員。乙未之役中，低階層生員在領導者中占不少的事實，應與乙未抗日的政治理念——恢復清朝體制有一定程度的關聯。（翁佳音，1986：90）

這樣的思想，讓抗日者有思想依據，較懷抱理想，也就能視死如歸，如徐驤在防守苗栗時，慨然以二十九人巡視城內外，夜宿城外。吳德功在記述徐驤之抗日時，表示有人問徐驤以眷屬者，

徐氏浩然曰：「有天道，臺灣不亡，吾眷可得也；臺灣亡，遑問家乎？」其後，徐氏轉戰於曾文溪一帶，每戰好衝鋒，或有勸之者，徐氏嘆曰：「此地不守，臺灣亡矣，吾不願生還中原也。」對於吳湯興、徐驤二人之抗日，吳德功表示「始則樹義旗於苗栗，一戰於大湖口，再戰於苗栗頭份，三戰於八卦山，妻亡子死，破家亡產」，「此二人既非有官守之責，又非巨富之家，亦欲効愚誠於舊君者，其歷境之慘苦，至今人猶憫之」。（吳德功，1959：75）

（二）客家抗日的特色

1. 善用防禦性民居

清代以來南北粵民因分類械鬥或民變而築之防禦性民居，在乙未時成為抗日的堡壘，對於日軍的攻擊形成很大障礙，故常多加描述，在北客部分，如提及安平鎮，「他們的第一道防禦線是竹林，竹高約一米有餘，盤根糾結，縱橫交錯」，「他們所盤據的屋厝是以耐火磚瓦建成，周圍竹林濃密，牆壁四周皆開有被掩蔽起來的槍眼，其設置甚至為二段式或三段式的，然而敵軍槍火最具威力者是來自牆壁最上層，可越過外部圍牆頂向外俯射，使我軍根本無法接近圍牆」，「加上他們有防範番人的習慣，視死如歸，敵兵能憑藉此孤壘支撐達數日之久，也不是毫無道理的」。（許佩賢譯，1995A：123）或言龍潭陂，有著無法衝破的竹林環繞著，而很厚的竹籬與圍繞著房屋的無數的有刺樹木交織，在竹籬後面緊接著有土屋，這小屋又有無數小孔，隨時可作為小型堡壘，非用砲火不易攻取。（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228）或言楊梅壠，「由於賊兵據守的屋宅堅固異常，即使用各種器具、炸藥都無法破壞，砲兵也因為周圍樹木的妨礙，無從展現其射擊威力」。（許佩賢譯，1995B：144）

在南客部分，如言六堆，「客家據說是廣東移住民的總稱，在

管下港東上、中里及港西上、中、下里間有七十餘庄，採取不完全的屯田兵體制，其性慍悍，各庄皆築有堡壘，並設有城門，或穿過狹窄的濠溝密植竹林，以構築簡單的要塞」。(蕭英伸譯，2004：112)或言茄苳腳，該村周圍環繞矮石牆圍，高三、四公尺，上挖槍眼，矮牆中亦設有副廓，外有寬二米、深四尺餘之濁水壕溝，並有竹林、竹筐。每道牆上皆有銃眼，「只要用幾門加農砲就可以使該地成為堅強的堡壘」，且「充分利用其地形之利，環繞該村之溪流大大的妨害日軍由近距離來攻」，(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245；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六)：42；陳怡宏，2019：472)。或言火燒庄，「門是以三尺大竹為框，再綁上八、九層刺竹的十網大竹門，不易破壞。而沿著竹門連著的竹垣有三尺許，在土堆上種竹子，成為堅固的防禦網」，(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七)：361)「各處並安裝鎗眼以及埋設砲台，另外並鑿成深一米乃至二米，寬三米到六米的繞境水流，水深足以沒人，使人難於前進」。(蕭英伸譯，2004：117)或言麟洛庄，「入庄所見，其濠溝深沒人身，入庄門，各村民的牆壁皆鑿有槍眼，頗為堅固，且村庄四周以竹林柵欄圍繞，儼然是一座城」。(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七)：367)

2.游擊戰與反覆欺敵之術

客家在乙未進行游擊戰，比較多是發生在桃園、新竹一帶台地丘陵之間，由於土豪、鄉民的組織鬆散，亦無整齊的軍械。故其戰鬥方式，多只能是利用地形、地物的游擊戰或巷戰。(吳密察，1995：40)如日方稱在安平鎮襲擊日軍兵站線的民兵，「此等地區之賊徒並非軍隊，而係土寇，忽隱忽現出沒於叢澤山野間，我軍窮追，僅能徒然疲於奔命」，(徐國章譯註，2005：55)或言新竹以北、大湖口以東之地，全民皆為土勇，「這些土勇只要一看到我軍人少可欺，就會發動攻擊；若是我軍人數佔優勢時，則逃匿到

山林之間」。(許佩賢譯，1995A：115) 日軍也看出民兵據地自守的特性，指出當時參與抗日的義民、義勇或鄉勇，因無旗號軍裝，且因補給關係未便遠程行動，於敵前晚間則仍散歸家中，臨機鳴鉦敲鼓嘯聚以對陣，但也承認，這些「民勇之實力勝於正規軍，在各地戰鬥中常構成賊之主力」。(蔡伯壘譯，2008：121)

此外，乙未之役參與抗日的客家，由於多是只是尋常百姓，故在抵抗時常以反覆立場欺敵，Davidson 留下相當多此類的觀察紀錄。如言由吶喊殺人的強盜搖身一變為笑臉的和平的農夫，由華人而言，這轉變是太容易了，可是，經過此一變，日軍就完全沒辦法了！或言「常常是一小時前之採茶人現在已是高喊的敵人」，或表示日軍在臺灣所遭遇的最大障礙是笑面孔的村民，他們站在懸掛白旗的門口看軍隊走過去，對這些住民日軍起初親切的講話給以笑臉，可是若是他們覺得日軍兵力少可保安全時，日軍還沒走失之前，由同一個門口向這一批不幸的軍隊槍彈就飛過來了，軍隊轉過來時只看見四肢不全的同伴倒在街中。(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225、227、254)

隨軍記者也提到，一行往三角湧及大姑陷偵察的騎兵，因迷途而問農民，農民親切地指引了一條狹路，當日軍困頓於路上徘徊躊躇時，忽然一聲砲響，響徹山中，當時有偽裝為農民者五人三人持續不知從何而來，以隱藏的小槍，從四方齊射而來。深刻感到「過去含笑濃霧淡煙杳然的山河，今含殺氣，四周草人」。(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三)：56) 竹越與三郎亦稱，「新竹以南的清軍並非軍隊，而是土寇，出沒叢澤或隱匿山野之間」，「土民與土寇難以分別；在田野揮鋤工作的良民，看我軍稍微勢寡，則一變為土寇」，「在大姑陷與新竹一帶陷入苦戰是因為該地是以頑冥猛獍著稱的客家族」。(竹越與三郎，1905：148-149) 另一則相同的描述表示，「土民和土寇，不易分辨，大都是於田園揮

鍬作如良民狀，一旦見我軍勢弱，即乍然改變，恣行反逆」。(徐國章譯註，2005：55)當時在臺的外國記者麥雅士也稱，「彼等對日人之暴行，屢復極其卑劣，如表面殊表厚誼，誘入市中後，始出其不意，由四方攻擊，令其無暇還手，致死創傷自如」。(程大學編譯，1977：87)

3. 慄悍、頑抗的抗日形象

雖然是戰場上的敵人，但客家在交戰時的頑抗不屈，讓日人留下不少欽佩之詞，如言「始終頑強的賊徒一步也不退，從竹門柵欄竹林中射擊，一個接一個，真是令人佩服」，「臺民兵勇視死如歸」，「他們不同於華北清軍，實際上非常剽悍」。日軍帶進攻安平鎮胡嘉猷住宅時，發現他們的敵人，「其剽悍與那些清軍一聽到一發砲聲就逃跑，不可同日而語」，「工兵爆破大門，又在敵人的兩間房屋側面約兩公尺處，打穿四面破牆孔，若是普通敵人，受到轟然砲擊、爆破穿牆、彈如雨下應該會退卻，但是，他們勇猛決死，依然在側面防禦，沈著使用槍孔繼續狙擊」。(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七)：361；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二)：189、346、362)

《東北新聞》也有不少相關的描述，如1895年9月8日「西山魔鬼軍曹之戰績」中表示，竹苗一帶的戰役中，「較之真正臺灣兵，反而是義民兵穿有(義民正勇右哨)或(義民伏勇哨營)之圖案外套者才真強悍」。同日「臺灣賊徒之現況」的報導中寫到，受到廣東兵及土民兵而負傷的日兵，多以刀傷為主，那是因為「彼等攜帶類似青龍刀之刀劍，見我小部隊不單僅狙擊，常會掄起此刀劍近逼。然而劉永福所率領之福建兵，便似乎全無掄起刀劍近逼之勇氣」。8月25日「臺灣戰鬥談」中亦稱，「此客家人於戰鬥之際，跣足裸體，不論山河沼澤，攜槍活躍，熟悉地理，奔走最

為敏捷，或從竹叢中狙擊或從窗隙間射擊，慍悍不畏死，其勇氣非支那兵可比」。(陳怡宏，2019：214、217、263)

4.全民參戰

客家於乙未之役中最讓日人與西人覺得詫異的是女性參戰的情形頗多，甚至老人、小孩也加入抵抗行列。如大谷城夫《臺灣征討記》中言，「我們從潛伏處暗中窺伺敵人的動靜。只見每二十人或每三十人成群，集在這處，集在那處，其中還有婦女執槍者，宛然如見美國十三州獨立時之情景……，當我們且戰且走時，敵人卻出現於我們的前後左右，依然對我們狙擊。最令人驚訝的，就是婦女執槍在追趕我們。因此，可以說這個地方不管草木山川莫非敵人」。(轉引自吳密察，1995：37)《東北新聞》1895年10月1日，關於第二團後備隊第四聯隊第二中隊的報導中提到，「臺北一帶之婦女多有纏足，無法為用，臺北以南之地則不同，足部大小乍看與男子無異，僅髮樣歧異，實難分男女之差異，男女皆強壯有力，甚為驚人」，「婦女亦能持竹槍或鈍刀襲擊日本軍人」。(陳怡宏，2019：289)

日方的紀錄中，最常在大嵙崁或三角湧一帶發現女性，如言「大姑陷偵察的騎兵發現，當地的婦女亦攜帶武器」。(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三)：56)「在大姑陷一帶」，「據聞甚至連婦女都發聲大吼，持槍械出戰」。(徐國章譯註，2005：55)「我軍攻擊大姑陷，衝鋒進入市區時，不要說是男子，就連十五、六歲的少年及婦女也都拿著武器抵抗我軍。可順帶一提的是，賊兵使用間諜似乎也不太用男子，而以女子居多」。(許佩賢譯，1995A：135)「三角湧之役後，戰死者中數見女性屍體」。(程大學編譯，1977：5-6)

據吳濁流稱，日軍於7月1日猛攻安平鎮胡嘉猷宅時，在民

兵中亦有一女性。「她不怕炮火，抱著大竹簍，把飯團一個一個分給抗戰的人員」，並曾在兩軍對陣過程中，「命大家把迫擊砲抬到中庭，裝入所有的彈藥，打開門樓的門扉。日軍見了，一齊進攻過來，主婦向迫近過來的敵人瞪視一限，看準適當的時機，親自在導火線上點了火。轟然一響，日軍倒臥滿地」。(吳濁流，1989：135) 日軍石光真清也表示，自從參加臺灣的戰鬥以來，「我屢次看到女人的屍體，而每看到她時，我就感到臺灣民眾對日本軍是強烈地痛恨著，同時我也預料到今後的戰鬥不是輕而易舉的」。(石光真清著，梁華璜譯，1983：77-78) 又，8月6日日軍從新埔出發，過水尾庄後遇襲，後來隨軍記者看到被日軍殺斃的死者中發現一武裝的美艷屍體，經仔細檢查，是扮男裝的女兵。(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四)：9)

在南客部分，也有女性參戰的事例，如日軍登陸枋寮，向埔頭行進中，發現有約四、五百人在埔頭附近出沒，加以攻擊後，「看到一名婦女亦混在其中向我射擊」。(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六)：32) 日軍進攻茄苳腳時，即有如下之經歷，「賊徒何所支耶？右往左走，東奔西驅，進入各民室倚窗射擊，故我軍負傷增加，敵之頑抗連十二、三歲之小孩亦起而抵抗」，(轉引自吳密察，1995：44) 或「婦女、兒童也拿起武器，列身於行伍之間」。(許佩賢譯，1995B：404)

六、結語

綜而觀之，客家在乙未之役，自臺灣民主國成立當時就參與其中，北客之抗日由新竹甚至到臺南，或至六堆客家募勇，呈現的是一種動態流轉，而又環環相扣的關係。客家的抗日，就戰局而言，發揮強大的抗拒力量，不僅牽制日軍南下的速度，迫使日本必需以增兵，改行軍政，厲行掃攘戰略以求占領臺灣，甚至在

宣布平定臺灣後，六堆仍對殖民政府造成一定的壓力。以下略述參與乙未之役對客家造成的可能影響，以代結語。

Davidson 表示，乙未之役中民軍之戰死者之數很難證實。在各戰役中遺棄於戰場的死屍共有 6,760 具。他認為，這數目可以增加 1,000；因為很多傷者或被其戰友救走，或是投身於溪流而被沖入大海。因此他估計民軍之戰死者每日達 45 人之譜。（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252）在這龐大的陣亡數字中，一定包含為數不少的客家。如連橫嘗曰：「乙未之役，蒼頭特起，執戈制梃、受命疆場，不知其幾何人」。（連橫，1962：1037）本文所述尚是文獻曾經紀錄者，但更多是在力抗中陣亡或遭屠殺的沒沒無聞者。其中的妻離子散，或可由客家歌謠略窺一二。如描述姜紹祖妻陳氏在得知紹祖死訊後，「細聲不敢大聲哭，又驚娘親來聽真」，「夢見我夫床上睡，醒來不見夫影身」。（黃筱婷，2010：32）麥雅士亦嘗謂，「客家之遭誅戮者，更無可枚舉也，最值憐憫者，莫過客婦孺童幼，彼等既失容身之家屋，左右逢禍，一方雖有日兵，但尚不能給予彼等能自地方酋長獨立之保護，因一方尚有客家瘋狂逞其狼藉殺戮，且彼等皆目不識丁，其所操客家話，亦屬特殊語言，殊不解日人所示諭告，乃唯有彷徨於五里霧中矣！」（程大學編譯，1977：87-88）

除了人員的傷亡，客家聚落也因戰火遭受莫大的損害，由於客家多以民宅為掩護，而日軍則多以燒毀民宅的方式掃蕩，故而「凡粵人部落。有屋皆燒。無捕不殺。幾成廢鄉」。（植亭，1907）於是「日軍到處盡燒屋，新埔芎林化為塵」，（楊鏡汀，1995：27）六堆的西勢庄成為「廢屋敝舍三、四十戶人家的一處孤村」，（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七）：368）被日軍焚燬後的火燒庄，「原來庄內戶數大約三百多戶中僅剩四五戶，灰燼間到處見到死屍及雞犬水牛等，狀極淒慘」。（蕭英伸譯，2004：117-118）

參與乙未抗日對南客的另一重要影響，是造成六堆的解體。因為六堆必須繳械，日方甚至要求不得再用六堆之名，於是清初以來屏東平原客庄的六堆鄉團組織，從名到實都難再存在，面臨解體命運。此後，六堆武力瓦解殆盡，已無法維持地方秩序。因此於明治 28 年 11 月，「鳳山縣下淡水粵籍上、下前堆十三個客庄只得聯名呈請日本官憲指派軍警維持和平」。（蕭英伸譯，2003：71-72）

客家在乙未之役的積極表現，讓殖民政府對臺灣的客家充滿好奇，於是在明治 30 年進行了一次全島性的「喀家族」調查，也進而影響他對臺灣方言人群的認知，之後進行臨時戶口調查時，不再使用對本島客方言人群而言屬外來詞的「客家」或「喀家」，而改以廣東人代之，卻進而扭轉了廣東人原本的省籍意涵，將之視為方言人群之名詞⁶。

最後，由於殖民政府對南北客家義民精神之肯定，事後未多加秋後算帳，南北客家在整個日治時期，除初期少數零星的抗日，或曾參與左翼運動外，其拒日的行動相對於福佬，是沈寂的。有學者即言，客家於武裝抗日的高潮結束後逐漸接受日本的綏撫，非但對於日本的統治威權不造成威脅，而且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建立與維持。因此，到了武裝抗日結束後，客家的原先社會領導階層，已不再對日本帝國的殖民政權，發揮民間社會的「反支配、爭權益」之行動力量。（蕭新煌、黃世明，2001：152）

⁶ 更詳細的說明可參見林正慧，《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參考書目

- 〈臺灣近狀〉，《申報》，上海，1895年8月13日，版1。
- James W. Davidson 著，蔡啟恆譯，1972，《臺灣之過去與現在》（第一冊），臺灣研究叢刊第107種。臺北：臺灣銀行。
- 王世慶，1989，〈外國記者和外商筆下的乙未之役〉，《臺灣風物》39（2）：81-93。
- 丘念台，1981，《我的奮鬥史》。臺北：中華日報社。
- 丘琳輯，1958，〈邱逢甲信稿〉。《近代史資料》1958（3）：36-47。
- 丘瑞甲，1960（1912），〈先兄倉海行狀〉，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嶺雲海日樓詩鈔》，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70種，頁367-370。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史久龍，1976，〈憶臺雜記〉。《臺灣文獻》26（4）與27（1）合刊：1-23。
- 石光真清著，梁華璜譯，1983，〈『城下之人』——乙未日軍侵臺實記〉，《臺灣風物》33（3）：77-78。
- 江山淵，1973，〈邱逢甲傳〉，收入楊家駱主編，《中日戰爭文獻彙編》，第六冊，頁395-403。臺北：鼎文書局。
- 竹越與三郎，1905，《臺灣統治志》。東京：大橋新太郎。
- 吳密察，1995A，〈乙未臺灣史事探析〉。頁535-559，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歷史學系編，《甲午戰爭一百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歷史學系。

- 吳密察，1995B，〈導讀一、《攻臺戰記》與臺灣攻防戰〉，收入許佩賢譯，《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臺北：遠流出版社。
- 吳密察編著，2015，《乙未之役打狗史料—中文編》。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國立歷史博物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 吳德功，1959，《讓臺記》，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割臺三記》，文叢第5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吳濁流，1989，《無花果》。臺北：前衛出版社。
- 呂理政、謝國興編，2015，《乙未之役隨軍見聞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李文良，2015，〈一八九五年臺灣政權轉換之際的大崙崁社會〉，《歷史臺灣》10：5-30。
- 李生，1907，〈回想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7年5月1日，版4。
- 沈雲龍，1977，〈連雅堂與丘倉海〉。《傳記文學》30（5）：79-80。
- 易順鼎，1965，《魂南記》，文叢第212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松崎仁三郎，1935，《嗚呼忠義亭》。高雄州：松崎仁三郎。
- 林正慧，2015，《臺灣客家的形塑歷程——清代至戰後的追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邱文琳筆錄，1995，〈抗日老兵湯錦輝君談姜紹祖營長並肩作戰事蹟〉，收入姜紹祖烈士成仁一百週年紀念專集編輯小組編，《乙

未抗日史事記要：姜紹祖烈士成仁一百週年紀念專輯》，頁30-37。出版地不詳：中華客家臺灣文化學會。

邱榮舉總編輯，2016，《2015 桃園市乙未·客家紀念活動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桃園：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邱蓬新總編輯，2016，《「一八九五乙未戰爭與苗栗客家研討」論壇專輯》。苗栗市：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俞明震，1959，《臺灣八日記》，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割臺三記》，文叢第57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姚錫光，1967，《東方兵事紀略》。臺北：文海書局。

姜紹祖烈士成仁一百週年紀念專集編輯小組編，1995，《乙未抗日史事記要：姜紹祖烈士成仁一百週年紀念專輯》。出版地不詳：中華客家臺灣文化學會。

思痛子，1959，《臺海思慟錄》，文叢第4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洪棄生，1959，《瀛海偕亡記》，文叢第59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徐國章譯註，2005，《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篇）中譯本I》。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根誌優，2012，《臺灣抗日史圖輯》，上冊。臺北：臺灣原住民出版有限公司。

翁佳音，1986，《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標下管帶興字副中營造送卑營新募各哨官護勇什長正勇伙勇姓名清冊〉。典藏號：20140110020。

張曉輝、付祥喜，2002，〈邱逢甲離臺內渡新考〉。《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3（1）：60-65。

曹永和、吳密察編纂，1986，《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經濟篇、軍事篇》。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梁華璜，1974，《光緒乙未臺灣的交割與保臺》。高雄：庚子出版社。

許秀霞，2011，〈做客「成功」、成功做客——臺東縣成功鎮客家家族記事〉。《臺東大學人文學報》1（2）：137-177。

許佩賢譯，1995A，《攻臺見聞：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臺北：遠流出版社。

許佩賢譯，1995B，《攻臺戰記：日清戰史·臺灣篇》。臺北：遠流出版社。

連橫，1960，《臺灣詩乘》，文叢第6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連橫，1962，《臺灣通史》，文叢第12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忠純，2011，〈報刊輿論與乙未反割臺鬥爭研究——以《申報》為中心〉。《臺灣研究集刊》2011（2）：45-53。

陳怡宏編，2016，《乙未之役中文史料》。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陳怡宏編，2018，《乙未之役外文史料編譯（一）》。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陳怡宏編，2019，《乙未之役外文史料編譯（二）》。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 陳漢光，1948，《臺灣抗日史》。出版地不詳：守堅藏書室。
- 陳漢光，1952A，〈平鎮與胡阿錦〉。《臺灣風物》2（2）：22-23。
- 陳漢光，1952B，〈姜紹祖——臺灣抗日先烈傳略之一〉。《臺灣風物》2（3）：6。
- 陳漢光，1959A，〈「新竹附近之役」記吳湯興與日軍之戰〉，收入〈民族英雄吳湯興文獻彙輯〉，《臺灣風物》9（5/6）：20。
- 陳漢光，1959B，〈「臺灣抗日人物事略」記「吳湯興」〉，收入〈民族英雄吳湯興文獻彙輯〉，《臺灣風物》9（5/6）：18。
- 植亭，1907，〈乙未大變錄（二）〉，《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7年5月3日，版3。
- 程大學編譯，1977，《臺灣前期武裝抗日運動有關檔案》。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黃秀政，1992，《臺灣割讓與乙未抗日運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黃富山等解讀，何鳳嬌、林正慧、吳俊瑩編輯，2013，《霧峰林家文書集：墾務·腦務·林務》。臺北：國史館。
- 黃筱婷，2010，《〈姜紹祖抗日歌〉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中文組碩士論文。

楊蓮福總編輯；闕正宗編譯，2014，《甲午戰爭——臺灣篇：甲午戰爭 120 周年紀念專輯：《日清戰爭實記》編譯附劉永福抗日《草莽奇人傳》》（一）至（七）。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楊鏡汀，1995，〈「乙未抗日客家故事歌」評述〉，收入姜紹祖烈士成仁一百週年紀念專集編輯小組編，《乙未抗日史事記要：姜紹祖烈士成仁一百週年紀念專輯》。出版地不詳：中華客家臺灣文化學會。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1994，《臺灣總督府檔案中譯本》，第三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1895，〈南征枝隊下淡水溪地方ノ土匪ヲ剿討ス〉，《臺灣史料稿本》，明治 28 年 11 月 26 日，不著頁碼。

蔡伯壘譯，2008，《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上卷）中譯本》。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蔡青筠，《朝瑛漫錄》，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藏，不著頁碼。

鄭天凱，1995，《攻臺圖錄——臺灣史上最大一場戰爭》。臺北：遠流出版社。

鄭喜夫，1981，《民國丘倉海先生逢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蕭英伸譯，2003，〈1895 年日軍的阿猴紀行〉。《屏東文獻》7：70-86。

蕭英伸譯，2004，〈日軍的阿猴紀行（續）〉。《屏東文獻》8：111-133。

蕭新煌、黃世明，2001，《臺灣客家族群史·政治篇》上。南投：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嶺雲海日樓詩鈔，1959，〈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臺灣風物》
9 (4)：43-46。

薛雲峰，2008，〈「義民史觀」之建構：析論臺灣一八九五年（乙未）抗日戰爭中之義民軍統領邱逢甲與吳湯興〉。《國家發展研究》8 (1)：43-90。

薛雲峰，2009，《臺灣客家史觀：以義民與 1895 乙未抗日戰爭為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鍾王壽主編，1973，《六堆客家鄉土誌》。屏東：常青出版社。

羅香林，1934，〈邱逢甲先生傳〉，《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2 (5)：129-134。

羅香林，1965，〈丘滄海先生傳〉，收入《乙堂文存》，頁 63-71。
香港：中國學社。